

中共合肥市党校学报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刘东锋等 辩证思维能力及其提升路径探析

郑玉豪 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的重要议题、评价及未来趋势

刘玉勉等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法律服务聚集区的作用机理与推进路径

张佳琴 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路径研究

2025年第1期（总第111期）

第24卷 双月刊 1月30日出版

征稿启事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是中共合肥市委主管，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合肥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本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关注改革发展前沿问题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围绕省情、市情选稿组稿，大力开展政策研究、市情研究、咨政研究和理论宣传，形成了具有浓厚时代特征、地域特点、党校特色的理论宣传平台。

本刊于2003年入编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进入CNKI中心网站。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为进一步提高本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将本刊打造成为“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的学术名片和重要窗口”，现向社会公开征稿，热诚欢迎广大社科工作者惠赐佳作。

投稿须知：

1. 稿件应当主题突出、观点鲜明、论证严密、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本刊特别欢迎关于“安徽省情、合肥市情”方面的研究报告。

2. 稿件字数以4000—10000字为宜。

3. 将正文以附件形式发过来，并将单位名称、详细地址、邮编、电话、电邮、摘要、关键词（3—5个）、来稿日期、作者简介（出生日期、民族、职称职务、学历学位、研究方向等）放在正文标题下。

4. 参考文献、注释等放在文尾，勿用脚注或夹注。注释是作者对题名、标题或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须放在正文后的参考文献之前，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注：①、②、③……。参考文献是作者写论文时所用引文的出处或参阅的各种书刊资料，须集中列在论文的文末，参考文献序号标注：[1]、[2]、[3]……

5. 来稿文责自负，在不改变文章主要观点的前提下本刊编辑部有权对文章作适当修改，若作者不同意修改请在来稿时作特别说明。

6. 本刊已被“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等收录，如作者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在网站或光盘上同时刊出。

7. 请勿一稿多投。本刊的选稿周期为3个月，3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请作者自留底稿，来稿一律不退。

8. 本刊选稿以质量为唯一标准，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并寄送2本样刊。

9. 本刊目前并无网上投稿平台，也未委托任何组织或个人代为征稿。一些打着本刊所谓“官网”名义的网上投稿、征稿平台，骗取作者审稿费、发表费的行为，均与本刊无关，均属非法行为。请投稿作者切勿上当受骗。

本刊样刊浏览网址：<http://hfdx.hfzhi.com/>

本刊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邮政编码：230031

联系电话：（0551）62206658 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2025 年第 1 期

(总第 111 期)

双月刊

主管单位：中共合肥市委

主办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

出版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陈得良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俊 王辉龙 王良仲 王 义 王 玉 王智源 江 飞

江 浩 刘玉勉 孙维红 陈得良 何永义 李安福 李敏琪

李宗开 范观兵 金 玥 周良金 胡爱敏 胡厚翠 凌德政

陶晓娟 黄传霞 程千宜 瞿晓陆

主 编：马 俊

编 辑：黄宁平

朱少家

徐书琴

理论视野

辩证思维能力及其提升路径探析……………刘东锋 王玉堂(3)

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的重要议题、评价及未来趋势……………郑玉豪(9)

策论园地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法律服务聚集区的作用机理与推进路径……刘玉勉 黄建国(18)

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路径研究

——以南通市海门区为例……………张佳琴(23)

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供给研究

——以江阴市“澄艺快递”为例……………申静文(28)

数字媒体时代下青年审美异化的具体表现、形成原因与矫正路径……………李博(33)

版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本刊合作单位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发 行:《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通信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62206658;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674-500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4-1249/Z

学思札记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思想论析 王也 周成(42)

高校思政课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的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张荣康(50)

信息荟萃

“‘城’与‘人’的双向奔赴”等五则.....(54)

辩证思维能力及其提升路径探析

刘东锋 王玉堂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淄博 255049)

[摘要]辩证思维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思维,亦即对立统一思维,是一种“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克服极端化、片面性”的思维方式。辩证思维能力,就是遵循对立统一规律,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运用辩证思维观察世界、判断形势、认识问题、化解矛盾,领导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辩证思维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必须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养;注重加强实践历练,在干事创业的实践中锤炼辩证思维、提高辩证思维能力。

[关键词]思维方式 唯物辩证法 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1][29]},而且,“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1][29]}。辩证思维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思维,亦即对立统一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核心。坚持辩证思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特点,也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遵循。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既面临重大战略机遇,也面临严峻风险挑战,只有养成辩证思维自觉,主动进行思维能力锤炼,才能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提高辩证思维能力,从而更好地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在正确认识、科学分析、有效解决问题中赢得主动、赢得

收稿日期:2025-01-18

作者简介:刘东锋,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王玉堂,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

未来。

一、辩证思维与辩证思维能力

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人们思考问题的立场、观点、方式不同,便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是人们运用一定的思维方式,能动地透过各种现象把握事物内在联系的能力。辩证思维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一种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矛盾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 and 变化”^{[12]213}。这就意味着,辩证思维是一种“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克服极端化、片面性”^[13]的思维方式。“一阴一阳之谓道。”^{[14]340}辩证思维强调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对立统一,承载着中华民族“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15]6}的传统智慧,“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16]910}。辩证思维能力,说白了就是坚持和运用辩证思维的能力,亦即遵循对立统一规律,“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13]。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6]875}辩证思维是理论思维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16]399}。实践证明,只有拥有包括辩证思维在内的强大思维能力,才能更好地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仅如此,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需要辩证思维,只是人们“日用而不知”罢了。也就是说,辩证思维能力是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思维能力。所以,毛

泽东同志指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17]311-31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养成了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的习惯,终身受用”^{[18]142}。

领导干部是党的执政骨干,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核心是提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使命的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战略高度,向全党提出“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19]17}的要求。这里,“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内在统一的思维能力体系。提出并加强这七大思维能力建设,深刻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哲学智慧,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的原创性贡献,是塑造领导干部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思维能力的科学指引。

二、辩证思维是中国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运用辩证思维观察世界、判断形势、认识问题、化解矛盾,领导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称“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10]75}。其实,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而且是公认的唯物辩证法大师,一向重视并善于运用辩证思维。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我们党“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方法”,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

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11]396}他对辩证法的运用，可以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坚持和运用辩证思维深入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12]1487}的艰苦探索和不懈奋斗，成功开辟了一条前人没走过且迥异于他国的正确革命道路，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将辩证思维运用于战略谋划、战术指导、战例分析，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料敌如神、用兵如神的奇迹，并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闪耀着军事辩证法光辉的重要著作，指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11]371}的严峻国际形势，毛泽东同志以高超的辩证思维智慧，鲜明提出在“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2]455}的应对策略，从容进行外交斗争和国内建设，“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13]。在深入思考、艰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成为我们党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奠基性、独创性理论成果，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

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是他鲜明的思想风格。他有一句曾多次被毛泽东同

志引述的名言：“照辩证法办事。”^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坚持和运用辩证思维谋划、解决实际问题，强调“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14]251}，“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15]240}；坚持用实践来检验我们的工作，“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4]272}；“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14]378}；“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4]373}，“计划和市场都得要”^{[14]364}；要承认矛盾、承认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14]42}，处理好先富和共富等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真正学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本领，以利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片面性、表面性、机械性，增强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16]287}，“如果头脑里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不可能以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来认识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17]433}。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同志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18]362}，要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努力提高探索解决新时期基本问题的本领。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体现辩证思维的本质要求，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突破，“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1]39}。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也是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的成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持和运用辩证思维、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指出,“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1]39},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24},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1]25};要“树立辩证思维和全局观念”^{[1]378},“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9]430};要坚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1]327},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20]。这些重要论述、重大论断,内涵丰富而深刻、系统而科学,为我们坚持和运用辩证思维研究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谋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战略思维擘画蓝图、筹谋全局,以辩证思维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以创新思维激发活力、增添动力,以底线思维守住边界、防范风险,大视野俯瞰天下、大跨度洞察古今、大手笔运筹谋划、大力度推进落实,展示了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卓越智慧、高超能力、宏大气魄,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化,在变乱交织的世界场景中,新时代的中国“风景这边独好”。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伟大成就,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伟大成就。

三、不断提高辩证思维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维能力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最直接体现。人要使自己聪明起来,最根本的办法是培养思维能力。”^{[8]142}辩证思维能力是一种高度抽象思维能力,既不可能与生俱来,也不可能后天自然形成,需要自觉地在深化学习、深刻领悟、深入实践中养成和提升。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21]16}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必须坚持不懈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习近平总书记告诫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不少人受过专业培训,不缺乏专门知识,但其中的很多人不懂哲学,不善于辩证思考,很需要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建议大家在学习原著的时候,读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著作,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22]辩证思维的理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只有深入学习、系统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才能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精神武器”和“伟大的认识工具”^{[23]311}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高辩证思维能力。

(二)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2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与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是党和人民进行创新创造、推动历史进步的智慧源泉^[25]。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9]15}，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挖掘、深度阐发、系统解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中汲取辩证思维的历史文化智慧，不断激发思维灵感、提高思维能力，增强辩证地看问题、想问题的思维自觉。

（三）加强实践历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实践磨炼，把火热的实践作为最好的课堂，让干部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26]572} 人类认识世界的规律表明，知识、经验可以在工作、生活中慢慢积累，思维能力、工作本领则需要在实践、实干中历练提升。按照现代领导力理论，10%的领导力是从书本上学来的，20%的领导力是从别人处学来的，70%的领导力是从领导工作的实践中学来的，这就是领导力提升的“127”法则^{[27]118}。辩证思维能力，既需要在干事创业的实践中锤炼，也需要在干事创业的实践中检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落在了当代共产党人身上，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必须起而行之，自觉担当责任、主动担当作为、奋力干事创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伟大实践中培养辩证思维，锤炼辩证思维能力。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是没有围墙的实验室，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是充满智慧的能量场。要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和创新创造中总结经验、汲取营养，从中提炼、概括出规律性认识，深挖蕴藏其中的辩证思维智慧，进而把握辩证思维规律、提高辩证思维能力。

四、结语

毛泽东同志指出，“辩证法是自然与社会的最普遍的发展法则，我们明白它，就得到了一种科学的武器，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革命实践中，就有了同这种实践相适应的理论同方法。……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是干部，都应用心地研究辩证法。”^{[28]42}“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6]901}，深刻揭示了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只有用心研究辩证法，真正懂得辩证法，才能善于运用辩证法，深入把握辩证思维规律、提高辩证思维能力，从而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科学的武器”，自觉用以观察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更好“把握事物本质、把握发展规律、把握工作关键、把握政策尺度，增强工作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29]，不断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注释：

- ① 引自《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页；《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2]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 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J].学习与研究，2010（3）：6-15.
- [4] 周易[M].杨天才，译注.北京：中华书

- 局,2016.
- [5]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王弼,注;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 [8]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9]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0]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董乐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 [11]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2]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
-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6] 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19]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0] 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强调 看清形势 适应趋势发挥优势 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N].人民日报,2015-06-19.
-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2]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学习时报,2009-05-18.
- [23]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4] 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9.
- [25] 王玉堂.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J].创新,2023(6):1-7.
- [2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27] 王玉堂.能说会写:领导干部的基本功[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
- [28] 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提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
- [29] 习近平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 着眼全国大局发挥自身优势明确主攻方向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篇章[N].人民日报,2023-05-18.

责任编辑:朱少家

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的重要议题、评价及未来趋势

郑玉豪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学界围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内涵要义、质量测度、实践进路等重要议题展开了分析研究,为该命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总体而言,学界取得了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着可以拓展的研究空间。为推动该命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应进一步增强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多学科、实践性研究。

[关键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新时代 重要议题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伊始就在不断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肩负起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使命,努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满足人民各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对共同富裕作出了创新性阐释,强调:“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42]},提出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应继续“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2]。基于此,有必要深入探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科学命题的研究趋势与发展方向,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新需求和新期待提供理论支撑。

基金项目:2024 年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对社会思潮的辨析和引导研究”(立项编号:24VSZ060);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中医药大学理论研究基地)开放课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提升研究”(立项编号:2024NMB008)。

收稿日期:2025-01-22

作者简介:郑玉豪,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中医药大学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的重要议题

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者们主要围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内涵要义、质量测度、实践进路等重要议题展开研究,同时针对其演进历程、现存问题等关联议题进行了探讨。

(一) 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研究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学者们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答案。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相关论述。杨勇兵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需要保证人拥有普遍丰裕的物质生活,也需要保证人享有较高水平的精神生活,这一理论构成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3]。燕连福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在统一关系,将丰富人的精神生活看作人类实现现代性的重要特征^[4]。廖小琴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构筑的理论框架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这既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的本质历史发展的具体呈现,更是人的需求层次提升的必然遵循^[5]。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相关论述。夏海燕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大同世界”思想资源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化基因^[6]。文丰安认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文化建设和创造的重视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图式和理论表达,为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命题的出场提供了重要的内生动力^[7]。刘旭雯则进一步指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关于“大同理想”相关论述在新时代的具象表征^[8]。

三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相关论述。辛世俊、王丹认为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对人民群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重视人的精神的相关内容,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形成和发展构筑了理论前提^[9]。刘东超认为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着既要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的相关内容,这表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10]。周泉、刘同舫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为何—是何—如何”的破题逻辑,形成了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科学认知^[11]。

(二) 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要义研究

所谓内涵,指的是一个概念或命题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对内涵要义作分析,有利于更深层次地研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命题。学者们从基本样态、功能作用、具体特征等维度探讨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要义。

一是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样态来考察其内涵要义。柏路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呈现出三重样态,具体包括:积极向上、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的心理生活;开放包容、和谐多样、优雅文明的文化生活;凝魂聚气、意义充盈、崇高笃行的信仰生活,三者构成“有根”的“可能生活”^[12]。段妍、刘冲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要义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从个体层面来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味着个体的精神世界处于充实且平衡的状态;从社会层面而言,其表现为全社会的精神风貌呈现出明净向善的状态;从国家层面来说,其体现为民族精神力量展现出磅礴且自信的气象^[13]。

二是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功能作用来考察其内涵要义。罗会德认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必然,是丰富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理论必然,是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历史必然^[14]。李辉、张议丹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美好生活的精神维度,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人本价值,进一步凸显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15]。蔡小菊、陈金龙认为中国共产党推动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有利于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更能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16]。郭广、李佃来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而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强劲的精神动力,同时为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17]。

三是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具体特征来考察其内涵要义。傅才武、高为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相对超越性,因此从这个角度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主要聚焦于个体维度,即在追求文化生活丰富性、审美体验提升、自我价值实现、科学素养培育以及群体归属感建构的过程中,使每个公民能够依托优质的公共文化资源,获得相对均衡的精神发展机会与资源保障^[18]。廖小琴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获得性和创造性、自主性和依赖性、可量化性和不可量化性、差异性和不可复制性等特征。鉴于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要义可以表现为一种幸福安宁的精神生活状态和富有完善的精神发展状态,即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国家、社会、群体、个体的精神需要能够在共建共享精神资源过程中不断得到满足^[19]。

(三) 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质量测度研究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质量测度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议题之一,对该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维度论”,学界在厘清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要义的基础上,主张从具体维度对人民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程度进行测度。孙豪、曹肖烨认为应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对人民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程度进行测度^[20]。陈钰芬、胡思慧认同这一观点,认为“富裕”维度可以细分为教育资源和文化基础,“共享”维度可以细分为区域共享、城乡共享和群体共享^[21]。余卫认为应从形式、事实和价值三个维度测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形式维度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形式合法性已经得到确证;在事实维度上,主要考量扎实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本质目的;在价值维度上,主要考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政策的社会效用^[22]。

二是“指标论”,大多数学者认为既然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可以建立起可评价的具体指标,那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可以且必须设计出可测度的指标体系。第一,“三指标”说。张仙凤认为安全感指标、获得感指标和幸福感指标为测度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程度提供了标准^[23]。第二,“四指标”说。刘利峰认为公民人文素养指数、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文明好习惯养成实现率、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构成测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具体指标^[24]。第三,“五指标”说。黄意武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评估体系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国民整体素质水平、文化产品供给效能、公共文化服务均衡性和精神文化消费品质作为关键指标来构建^[25]。第四,“六指标”说。王丰认为应从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和主观体验等六个层面分别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指标体系^[26]。杨蕙宁、谷彦芳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细分为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占比、文化传媒财政支出占比、文化及相关产业就业人员占比、每万人艺术表演场馆数量、人均图书馆藏书量、社会捐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六个方面的指标^[27]。第五,“七指标”说。吴朝邦、左亚文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应从领导、主体、引领、内容、时间、空间、实践等七个方面进行构建^[28]。陈思杭认为测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具体指标应包括公共图书馆个数、博物馆机构数、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人数、每千人中卫生技术人员人数、互联网端口接入数、旅客周转量、森林覆盖率等七个方面^[29]。

(四) 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进阶研究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着眼于理论层面的分析探讨,也需要聚焦于实践层面的具体进阶。在回答“如何实践”的现实问题上,学界围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价值引领、力量保证、关键支点、重要保障等展开了深入研究。

一是在物质基础方面,持续推动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又反哺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两者良性互动,构成共同富裕的完整图景。刘向军认为促进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应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持续促进物质财富增长,完善分配机制以增强群众获得感,并通过精准施策破解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现实障碍^[30]。陈思宇、胡承槐认为应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大工业生产方式,进而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富裕水平^[31]。

二是在价值引领方面,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社会成员精神世界的构建与美好生活的实现,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王淑芹认为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人民群众将形成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现代化国家的价值共识,深化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美好社会的理念认同,提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内在自觉,进而建构起真善美的精神世界^[32]。黄蓉生认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应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三个层面入手。在国家层面上,系统回应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社会层面上,精准对接人民群众“凝聚思想共识”“构建和谐社会”“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等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公民个人层面上,深度激活人民群众在道德情操、社交娱乐、理想信念、学习志趣等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33]。

三是在力量保证方面,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通过制度保障有效激发其参与积极性与创新创造活力,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内生动力。项久雨、马亚军认为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方面要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权利,另一方面要讲究方式方法^[34]。潘玉腾、金程远认为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主体自觉。第一,提升人民群众道德自觉和道德水平。第二,培养人民群众积极向上的文化生活方式。第三,调动人民群众奋斗进取的内在潜能^[35]。

四是在关键支点方面,加强人民精神文化资源高质量供给。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从源头上入手,有效供给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李建国、严春蓉认

为一方面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要义融进精神文化生产的全过程,着力打造既具思想性又具艺术性、既能体现时代化又能体现大众化的文艺精品;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推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丰富发展,共筑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此外,加强人民精神文化资源高质量供给还需要重视形式的创新,丰富文化娱乐的种类,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有机统一^[36]。麻国庆、牛家儒认为应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结合,扩大优质旅游产品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旅游消费需求^[37]。

五是在重要保障方面,增强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舆论引导。在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中,舆论场域发挥着价值导向校准与共识凝聚的关键性作用,其引导效度直接影响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刘影认为应利用微信、抖音、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做好正面宣传;及时澄清错误言论,加强对有关精神生活热点问题的科学引导;强化依法管网,加强互联网管理体制机制建设^[38]。王习胜、狄瑞波认为应强化舆论引导,廓清模糊认知,增进政治认同,提升规则意识,助力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政治观、法治观与道德观,推动其在优良社会秩序与先进制度文化的共建共享进程中迈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39]。

(五)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其他议题研究

除了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内涵要义、质量测度和实践进路开展研究之外,学界还聚焦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演进历程、现存问题等议题展开探讨。

一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演进历程研究。冯留建、王子环按照四个历史分期进行梳理,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

产党虽然没有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相关概念,但已经开始探索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精神生活发展,致力于建设一个文明先进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步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调要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不断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40]。王洪波认为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注意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后,精神生活的富裕在国家层面愈来愈得到重视。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致力于促进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同时,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努力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41]。

二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存问题研究。魏泳安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存在的明显短板是物质生活的现实掣肘、精神生活的模糊认识、公共文化的效能不足等^[42]。罗叶丹、褚湜婧认为当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人的精神生活主体能力有待提高、人的精神生活客观对象有待完善、人的精神生活环境有待优化等^[43]。张波、任艺璇认为在公共文化治理领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多重挑战:服务供给与需求匹配度不高、创新能力受限导致物质生产领域发展受限;多元主体间协同效应不足、社会交往秩序不完善造成组织空间割裂;价值认同缺失与形塑功能弱化,致使精神文明空间受到压缩^[44]。黄冬霞认为数字技术负向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精神生产的成本可能因数字垄断而提高,精神产品分配的不公正性可能因数字壁垒而扩大,精神交往互动的深度可能因“数字鸿

沟”而降低,精神消费异化现象可能因数字依赖而出现^[45]。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的评价

总的来说,学界围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行了广泛探讨,相关研究成果为该命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由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尚未达到成熟阶段,对该命题的研究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

(一)既有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

一是系统梳理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演进,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学理基础。作为这一命题研究的前提条件,厘清其理论渊源和历史脉络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实践具体展开。通过整合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廓清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发展和演进脉络,构建起兼具历史纵深与理论厚度的分析框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二是多角度探讨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质量测度问题,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如何衡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是新时代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围绕“维度论”和“指标论”两个方面,学界已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测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和量化工具,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高度概括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存问题和实践进路,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实践指引。坚持问题导向,找准问题症结,破解顽瘴痼疾,是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总的来看,学界既有研究以宏观研究为主,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这

些研究既具现实指导价值,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拓展的分析维度。

(二)既有研究存在的可拓展空间

一是既有研究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历史演进分析略显薄弱。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主要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历史分期,历史纵深感略有缺失,这可能直接影响到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本质规律的认识深度。诚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的新提法,但若能将这一命题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观视野中进行深入理解和整体观照,更能从根本上增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明根基与时代穿透力。

二是既有研究中对实证方面的探讨分析略显薄弱,导致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现状把握精准度不足。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偏重宏大叙事,且以规范研究方法为主,这种研究格局导致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评估和分析仍停留在定性层面。此外,现有研究侧重于统计分析,缺少参与式观察、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因此很难实现对不同群体的精准画像。未来研究应不断拓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与解释力。

三是既有研究中对微观实践路径的分析略显薄弱,难以有效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现有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研究主要聚焦于宏观层面,缺乏具有针对性和指向性的微观实践路径。而这种微观层面的实施路径,恰好能够激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未来研究应深入探讨特定地域、特定群体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践路径,从局部到整体,为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更为有力的学术支撑。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的未来趋势

学界高度重视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未来学界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研究应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 进一步深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性研究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个极具时代意义的命题,学者们对其的理解因学科背景、研究视角等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科学探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外延是研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首要问题。一方面,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行概念界定,必须厘清其与“精神文化需求”“精神文明建设”等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研究场域中,若缺乏对核心概念的学理辨析与历史语境锚定,将导致概念泛化滥用。另一方面,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行概念界定,必须基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演进的历时性维度,而非停留于共时性层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所创造的辉煌成就,为深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例参考。因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概念应在具体实践中进一步科学化。

(二) 进一步拓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多学科研究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涉及的要素很多,这就要求我们研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能局限于单一学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往往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经济学、信息科学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应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思维方法,对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展开全方位、立体性的研究。目前,学界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研究多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视角,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还相对薄弱。因此,要在恪守问题导向原则的基础上,突破传统学科壁垒,通过构建跨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行多维透视与整体把握,从而形成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

(三) 进一步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性研究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是理论命题,更是实践课题。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研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根本出发点。因此,未来研究要更加注重实践性,将理论与实践探索紧密结合。一方面,增强问题意识,找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痛点”。通过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等多种调研方法,深入了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群体最直接、最现实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探讨扎实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聚焦问题靶向发力,从“宏观、中观、微观”的统一中提升实践路径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使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此外,应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以便测度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同时也为调整、优化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对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
- [3] 杨勇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

- 辑、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J].党政研究,2022(5):53-59.
- [4] 燕连福.习近平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和实践路径[J].思想战线,2022(5):1-10.
- [5] 廖小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逻辑维度[J].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2(2):41-48.
- [6] 夏海燕.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的文化路径[J].江苏社会科学,2022(6):63-71.
- [7] 文丰安.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J].探索,2023(4):151-163.
- [8] 刘旭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发轫逻辑、认知结构和实践进路[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6):25-33.
- [9] 辛世俊,王丹.试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实践路径[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1(6):5-14.
- [10] 刘东超.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J].党建,2022(2):35-37.
- [11] 周泉,刘同舫.中国共产党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科学认知与价值追求[J].探索,2022(5):165-176.
- [12] 柏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意涵与价值遵循[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2):64-75.
- [13] 段妍,刘冲.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生成逻辑、时代内涵与现实进路[J].教学与研究,2023(3):38-46.
- [14] 罗会德.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价值与路径选择[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2):192-196.
- [15] 李辉,张议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思想教育研究,2023(5):3-9.
- [16] 蔡小菊,陈金龙.中国共产党推动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J].广西社会科学,2023(2):38-45.
- [17] 郭广,李佃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J].学习与实践,2023(11):13-22.
- [18] 傅才武,高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与指标体系[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11-24.
- [19] 廖小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科学内涵与衡量指标[J].思想理论教育,2023(6):33-40.
- [20] 孙豪,曹肖烨.中国省域共同富裕的测度与评价[J].浙江社会科学,2022(6):4-18.
- [21] 陈钰芬,胡思慧.中国省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3(6):89-104.
- [22] 余卫.共同富裕统计测度与评价研究[D].浙江财经大学,2023.
- [23] 张仙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构建探析[J].理论视野,2023(11):59-64.
- [24] 刘利峰.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研究[D].安徽师范大学,2023.
- [25] 黄意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观察与思考,2022

- (9):70-76.
- [26] 王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35-51.
- [27] 杨蕙宁,谷彦芳.共同富裕的动态演进、结构差异与收敛性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4(4):62-67.
- [28] 吴朝邦,左亚文.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探究[J].广西社会科学,2023(8):100-107.
- [29] 陈思杭.科技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3(17):17-22.
- [30] 刘向军.促进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J].红旗文稿,2023(5):45-47.
- [31] 陈思宇,胡承槐.“精神共富”何以可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的理论逻辑与推进路径[J].东岳论丛,2024(3):14-23.
- [32] 王淑芹.深化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认识[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1):72-78.
- [33] 黄蓉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9.
- [34] 项久雨,马亚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层次结构与实现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22(6):11-16.
- [35] 潘玉腾,金程远.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1-9.
- [36] 李建国,严春蓉.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意涵及其实践路径[J].科学社会主义,2022(4):18-26.
- [37] 麻国庆,牛家儒.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J].社会科学家,2023(5):120-125.
- [38] 刘影.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10):60-68.
- [39] 王习胜,狄瑞波.“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7):131-138.
- [40] 冯留建,王子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论渊源、历史演进和实践路径[J].思想教育研究,2024(11):71-80.
- [41] 王洪波.实现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论支撑、探索历程和实践方略[J].社会科学辑刊,2023(2):23-29.
- [42] 魏泳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刻度、短板及实现路径[J].探索,2022(5):177-188.
- [43] 罗叶丹,褚湜婧.矛盾论视域下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初探[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35-42.
- [44] 张波,任艺璇.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导向下公共文化治理的空间向度[J].山东社会科学,2024(6):167-175.
- [45] 黄冬霞.数字技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机理、风险及其防范[J].探索,2024(2):142-156.

责任编辑:马俊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法律服务聚集区的作用机理与推进路径

刘玉勉 黄建国

(合肥市委党校,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法律服务聚集区建设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法律服务聚集区的前期探索实践,从“定位-结构-效能”三个层面,探讨法律服务聚集区建设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理,即定位层面通过平台搭建、资源聚集等提升服务专业性;结构层面通过供需对接、服务细分等提升服务针对性;效能层面通过技术赋能、要素配置、流程重塑等提升服务便捷性,进而对法律服务聚集区建设提出系统构建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推进机制创新、形成共建态势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法律服务聚集区 作用机理 机制创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催化剂,更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助推器。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多地积极建设法律服务聚集区,旨在形成能级高、辐射广、功能优的法律服务载体。法律服务聚集区称谓包括但不限于“法务区”“法律服务中心”,是指聚集政法机构、法律服务、法学研

究、法治宣传等多功能法务资源于一体的综合性法治实践平台。法律服务聚集区建设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探讨其作用机理并对其未来建设路径提出优化对策建议,是学术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议题。

一、法律服务聚集区的实践探索与启示

法律服务聚集区提供高质量法律服务,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助力作用。系统地

基金项目:2024 年度安徽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课题“营商环境法治化视域下的安徽(合肥)创新法务区建设研究”(立项编号:QS2024054);2023 年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项目“合肥大科学装置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研究”(立项编号:2023CX038)。

收稿日期:2025-01-22

作者简介:刘玉勉,中共合肥市委党校政治与法律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黄建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政治与法律教研部主任,副教授。

分析、总结法律服务聚集区的前期实践探索及启示，对于深化理论与促进实践发展尤为必要。

(一)法律服务聚集区的实践探索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为了厚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土壤，多地打造了覆盖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的专业化法律服务聚集区。法律服务聚集区在一定空间内聚集知识产权、涉外商事等领域法务资源，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天府中央法务区、海丝中央法务区、前海深港国际法务区等法律服务聚集区业已启用(见表 1)，重庆中央法务区、昆明中央法务区、安徽(合肥)创新法务区等正在积极推进建设。各地搭

建的法律服务专业平台为新质生产力充分发展提供有效的法治供给，在探索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前期经验。

(二)法律服务聚集区的启示

各地法律服务聚集区建设稳步推进并取得一定成效。从前期实践分析，法律服务聚集区建设与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发展高度契合，为未来实践发展提供启示。

一方面，法律服务聚集区建设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法治供给。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可预期的稳定环境，法治保障是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环境的客观需要。法律服务聚集区引入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公证处、鉴定中心、仲裁委等机构入驻，面向市场主体打造全方位、全链条的法律服

表 1 部分已启用的法律服务聚集区

法务区	地点	建设特色	启用时间
天府中央法务区	四川成都	将“打造立足四川、辐射西部、影响全国、面向世界的一流法律服务高地”作为建设目标；建立全国首家中央法务区税收法律服务中心。	2021 年 2 月
广州湾区中央法务区	广东广州	创造性提出错位协同发展思路，依托市域各片区不同的资源禀赋、规划前景、建设潜力等因素，坚持错位发展、有机联系、协同提升。	2021 年初，正式提出建设
海丝中央法务区	福建	率先将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写入地方性法规，“立足福建、辐射两岸、影响全国、面向世界”，打造国际商事海事争端处理优选之区。	2021 年 11 月
前海深港国际法务区	广东深圳	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示范区为依托，打造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2022 年 1 月
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	上海虹口	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的国家战略，打造面向长三角、辐射全国、联通国际的法律服务“新平台”。	2023 年 6 月
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中央法务区）	陕西西安	以“立足陕西、引领西部、服务全国、辐射‘一带一路’”为战略定位，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高地。	2024 年 9 月，挂牌“中央法务区”

务窗口,提供全面、专业、高效的高质量法律服务。法律服务聚集区为创新活动的有序进行和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提供有力支撑,提振市场主体投资创业信心,进而带动产业项目。如海丝中央法务区培育警安法务科技特色产业,打造法治科技领域新质生产力^[1];天府中央法务区涉法务服务产业年产值接近百亿元^[2]。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法律服务聚集区建设提供需求导向。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壮大往往伴随着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涌现,新兴事物对法治供给提出新的需求,如知识产权保护、数据信息安全、跨境法律协调等。法律服务聚集区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供需对接由粗放匹配向精准匹配转型,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高水平法治软环境。多地法律服务区结合自身的优势资源、重点需求、法治基础等,通过功能提升与业态升级塑造涉外法治服务、法商融合示范等特色品牌,持续创新与完善法律服务板块。如海丝中央法务区设立国际海事纠纷多元化解的专门工作机构;天府中央法务区以优质仲裁资源打造全国商事纠纷的优选地等。

二、法律服务聚集区的作用机理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3]。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法治保障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二者存在着紧密的互动逻辑。法律服务聚集区建设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理可以从“定位-结构-效能”三个维度阐释。

(一)定位之维

从空间形态来看,法律服务聚集区通常与高能级商务区存在伴生关系,通过专业平台搭建与资源集聚,形成“法商融合”的发展环境。法律服务聚集区集聚司法、公

证、法援等法律服务资源及衍生配套资源,营造市场主体与法律服务专业主体的互动空间,推动法商融合发展。一方面,市场主体聚集为法律专业机构的业务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法务资源聚集为市场主体规范有序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营商环境随之不断优化。

(二)结构之维

从结构层次来看,法律服务聚集区基于法律服务机构需求布局法律专业服务与衍生配套服务,提升服务针对性。一是引入司法、仲裁等机构,汇集法院、检察院、仲裁委、调解委等,对法律服务要素集聚形成牵引作用。二是聚焦法律服务专业机构,汇集律所和公证、鉴定等机构及其专业人才,针对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商事纠纷调解等细分领域,提供专门法律服务。三是搭建类型化法治创新平台,集成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创新发展法律网络服务等智慧法务平台。四是整合会计、税务、审计等关联服务资源,激发法律服务融合创新的自生长力,构建全链条的生产性服务体系。从结构维度分析法律服务聚集区的作用机理,其不仅是物理空间上法律服务机构的汇集,也是资源集成上法律服务供给的复合叠加。

(三)效能之维

从服务效能来看,技术赋能、要素配置、流程重塑等环节有力支持了法律服务聚集区的服务效能,提升服务便捷性。就技术赋能而言,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自助服务终端、法律咨询智能设备等为法律服务赋能,提升法律服务的效能。就要素配置而言,法律服务聚集区汇集司法、公证等各类法律服务机构,为市场主体提供一站式的法治供给,节约市场主体寻求法律服务的时间成本。就流程重塑而言,法律服务聚集区在

同一区域内提供法律咨询、案件代理、执行监督等多元法律资源要素,以全面、连贯、高效的流程,促进法律服务标准化、集约化。

三、法律服务聚集区的推进路径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领域的革命性飞跃、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重构以及产业结构的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要稳步推进法律服务聚集区建设,形成聚集优质法律资源、提供便捷法律服务、集成应用科技要素的法律服务地标,以专业性、针对性、集约化的高水平法治供给,助推新质生产力充分发展。

(一)系统构建法律服务聚集区布局

一是系统规划法律服务聚集区总体布局。将法律服务聚集区的布局纳入区域发展规划与愿景目标,以改革思维从顶层设计出发谋划全局建设。法律服务聚集区的建设规划需要与区域总体规划、产业规划、城市规划等相衔接,以实现其在空间布局、功能定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区域协同。

二是因地制宜定位法律服务重点领域。基于各地不同的法律服务需求,如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大科学装置科技成果转化需求、沿海地区的国际商事海事法律服务需求等,因地制宜定位科技企业服务、新兴产业服务、涉外服务等重点领域。各地依托区位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等塑造法治品牌,打造各具特色的法律服务地标。

三是配套布设关联服务与衍生服务。依托法律服务聚集区平台载体,联动法学专业教育研究机构,融合法学研究、普法宣传、教育培训、会议论坛等关联服务与衍生服务功能,配套建设法律服务创新策源平台和法律智库中心。

(二)优化法律服务聚集区资源配置

一是推动国内与涉外法律服务的有机

衔接。建立健全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和平台,为涉外投融资、商事纠纷、国际经贸风险应对等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打造集仲裁、调解、诉讼于一体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平台,规范、优化跨国流转程序,便利跨国诉讼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以高水平涉外法治供给促进国际贸易扩容。提升专业服务机构在国际商事海事争议解决、国际投资贸易合规咨询等涉外领域的法律服务能力,协助市场主体获得目标国法律法规资讯,提升市场主体对外投资合作的整体安全观,强化市场主体国际化经营的合规经营意识与风险防控能力。

二是推动专业服务与科技赋能有机结合。其一,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推动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管理相关软硬件建设,在合同、诉讼、风控等业务场景中提供智能化法律服务,拓展区块链存证、智能法律文书、远程视频公证等技术应用,以技术创新赋能法律服务。其二,提高知识产权、资产评估、金融证券等专业服务领域法律服务效率,如建设分级分类运营的专利数据库,对高价值专利的市场化、产业化、投融资等提供高效率的专业法律服务。

三是推动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有机协同。构建法治创新平台与法律服务高地,需要线上与线下法律服务的有机协同。一方面,线下提供覆盖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的专业法律服务,通过定期或不定期举办政策推介会、法治讲堂、法律教育培训等,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线上搭建法律服务“云集聚”专门平台,平台对接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的公安司法业务系统,同时汇聚税务、审计、会计、知识产权等部门的相关法律资源,设置法律资源库、法律咨询、法律培训等板块,整合、汇总扶持政策、

教育培训等方面的信息和资源,逐步实现用户进一个端口即可获得全域内法律服务资源。

(三)推进法律服务聚集区机制创新

一是探索专业法务委托运营机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数据信息安全、新兴产业发展、涉外经贸服务等专业领域,探索建立法务委托运营管理机制,规范运营管理体系、项目内容、运作流程,助力高水平保护。

二是优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发挥法治供给对科技创新的助推功能,建立健全新质生产力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营造尊重创新、保护创新的良好氛围。鼓励建立新质生产力产业领域的专利联盟,采用订单式知识产权研发共享机制,降低产业创新成本。

三是建立专业领域风险预警机制。建立健全专利争端预警机制、专利信息保密制度等,提高高价值专利法律风险防控能力;建立健全涉外法律风险防控机制,对国际贸易中的信用风险、政策风险、价格风险等制定预警指标体系,加强对涉外法律风险的研判和预警,及时提示风险消减与应对措施。

(四)形成法律服务聚集区共建态势

法律服务聚集区依托法律服务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执法机构等优质资源,建构包括司法裁判、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等多元力量在内的服务载体,畅通法商信息交流,激发多元主体内驱动力,实现问题共治、资源共享、平台共建,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一是集聚专业服务机构力量。引进律师事务所、司法鉴定机构、法律科技类企业等法律服务机构和泛法律市场化机构,加速集聚资源、聚链成势,形成法商融合生态圈,持续提升辐射能级。提升法律服务机构

在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数据信息安全、涉外经贸等重点领域的专业服务能力,推动专业领域国际合作,提升市场主体竞争力。

二是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企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极重要参与主体,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胜于任何优惠政策^[4]。要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持续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新兴产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依法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落实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有效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权益,给予知识产权及其衍生品足够的创新发展空间。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依法保护企业权益,引导并保障资金、人才等驱动创新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流动,激发企业科技创新活力。

三是发挥“有为政府”积极作用。有效的政府治理与科学的宏观调控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客观要求。要精准把握“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内在联系,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优化政策供给,通过立法和政策引导,营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强化行政执法和司法衔接协同,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应及时回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主动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提供法治支持;加强市场监管,防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保障市场的开放、透明,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四、结语

作为现代法律服务行业的平台载体,法律服务聚集区大多承载着以高水平法治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使命。因地制宜建设法律服务聚集区,为创新法治实践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紧密结合提供平台,(下转第 27 页)

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路径研究

——以南通市海门区为例

张佳琴

(南通市海门区委党校,江苏 南通 226100)

[摘要]建设青年发展型县域,是推进乡村振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集聚势能的有力举措。本文以南通市海门区为例,梳理其在支持青年立业、实现青年乐居、激发青年活力、促进青年有为等四个方面的建设成效,同时指出目前还存在就业创业环境有待优化、安居宜居保障有待加强、文化情感联结有待筑牢、共建共治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从青年视角出发,提出提供优质服务助力青年立业、满足多样需求实现青年安居、创新文旅场景丰富青年生活、尊重主体地位推动青年参与等优化路径。

[关键词]青年发展型县域 成效 问题 优化路径

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为满足新时代青年多样化、多层次发展需求,2022 年 4 月,中央宣传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要求同步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和县域试点。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建设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而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探索具有特色的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的模式和经验,是推进乡村振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集聚势能的有

力举措。在第二批试点工作即将开展之际,总结成绩、发现问题,有助于精准施策,进一步提升政策整体效能。

一、南通市海门区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的成效

(一)支持青年立业方面

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是“引得来”青年的关键。围绕青年的职业发展需求,海门区不断丰富就业创业的服务内容、加大扶持力度。在就业方面,结合当地产业特色,抓好日常储备,打造“海门未来匠星”等遴选

基金项目:2024 年度海门区委党校调研课题“海门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路径研究”

(立项编号:24HMDX10)。

收稿日期:2025-01-19

作者简介:张佳琴,中共南通市海门区委党校助理讲师。

培育工作品牌，建立健全全区青年人才梯队化培育体系。同时，积极构建“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社会培训机构”三方联动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提升青年的职业技能素养，提高人岗匹配度。在创业方面，积极扶持电竞产业、低空经济等新业态及乡村特色旅游业态，强化优质项目环境要素保障，对符合“直通”引进条件的项目开辟创业人才“直通车”，近三年招引高层次青年人才创新创业项目 50 个，累计资助 1 亿余元。

(二)实现青年乐居方面

“住有所居”“住有宜居”是“留得下”青年的要义。结合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收入条件、不同家庭规模的青年多样化住房需求，海门区不断扩大住房支持的覆盖区域和人员范围，多措并举助力青年选到心仪的住所。在购房方面，创新性开展“青年看房团”活动，对于高学历、高职称的青年人才，适当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减少他们的购房压力。在租房方面，累计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6335 套，打造麓园国际人才社区、福海嘉园、拓宏产业园等一批高品质人才公寓，目前共有 9600 余套(间)投入使用。另外，针对来海门求职创业的高校毕业生的短期住宿需求，全区目前已建成 13 家青年人才驿站，符合条件的青年可申请享受青年驿站 2 年共计 30 天的免费入住。

(三)激发青年活力方面

加强特色文化建设，满足青年日常消费和社交活动需求，是提升青年生活幸福感和归属感的有力举措。海门区注重加强与青年的文化情感联结，多渠道多维度整合全区文旅资源塑造地标型城市 IP，筹办江海文化旅游季、“点亮海门之美”文旅夜市、长江口音乐节、海门马拉松等活动，打造青

年喜闻乐见的消费融合新场景。同时，大力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青龙港 1806、大生三厂、常乐张謇出生地等张謇遗迹资源串珠成链，形成“一轴、两带、六片区”全域文旅空间布局，打造青年业余休闲新去处。

(四)促进青年有为方面

广泛的社会参与既有利于青年健康成长，又为地方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海门区坚持发挥青年力量，凝聚青年智慧助力社会治理，提高青年的主人翁意识。每季度开展一次青年议事会和“共青团倾听日”，明确青年所思所想、所期所盼，结合青年建议，推出“团团晾衣架”等民生实事微项目 10 余项。另外，以青年为参与主体，常态化开展“青春伴夕阳”“冬日暖阳季”雁归学子志愿服务等项目，创新打造“电竞+公益”文明实践新模式，开展“汇”绿靓家园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近 200 场次，持续扩大青年志愿服务“半径”。

二、南通市海门区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面临的问题

(一)就业创业环境有待优化

海门区积极拓展青年发展空间，搭建就业创业平台，但就业创业环境还有待优化。就业方面体现为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一方面，有活没人干，就业岗位吸引力不强。对照先进地区，海门区产业多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附加值较小，层次有待提升，在职业发展空间、收入涨幅增速等方面仍有差距。另一方面，有人没活干，知识技能供需失衡。未就业青年数量较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毕业两年内未就业的大学生，缺少产业需求的实战技能，而学历又成为其“脱不下的长衫”。创业方面则体现为整体上具有创业意愿的青年占比不高，缺少资金平台支持不能创业、缺少基本知识

经验不敢创业、缺少抵御风险能力不想创业等因素导致“不创业”的现象较为普遍。另外,部分青年在具体的创业过程中,对资金扶持、创业兜底、税收优惠需求较大。

(二)安居宜居保障有待加强

总体上,海门区青年对居住环境满意度较高,但自主购房的内生动力不足,自有住房(房屋在自己或配偶名下)占比较小,且普遍反映房屋贷款压力较大。在笔者的抽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中,发现大多数选择租住的青年,租赁的房屋来源于市场,房租基本在1000元/月-3000元/月,租住成本相对较高。同时,青年的租房环境不够稳定,可能面临房租随时上涨、房东违约成本较低而承租人违约成本较高等情况。因此,青年普遍期待人才公寓、政府保障性住房等与支付能力匹配且长期稳定的居住房源。海门区在住房支持政策可及性、完善生活配套设施、优化职住通勤效率等方面有待加强。

(三)文化情感联结有待筑牢

海门区不断强化对青年的人文关怀和情感联结,积极提供青年需求的场景、设施和配套服务,但消费场景同质化、青年活动品牌建设的冲击力和竞争力不够强等现象依然存在,难以满足青年多元需求。笔者调查发现,近半数被调查者表示周末一般选择“宅在家里”,普遍反映海门区的休闲娱乐场所配套不完善、“没啥好玩的”“没有特色”。同时,他们对兴趣特长类、文体体育类、教育培训类等方面的青年社会组织或社团有一定的需求。另外,在婚恋及交友的情感联结方面,青年观念呈现多样化特征,总体上对海门区在婚恋及交友方面的工作(如常态化组织开展的“缘·东洲愿”联谊交友活动等)参与程度不高,社交范围较窄。

(四)共建共治机制有待完善

青年积极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挺膺担当,实现双向奔赴,是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的最大优势。目前,海门区青年社会参与所涉及的各个部门在制定具体政策时,多基于工作系统内部需要,青年发声渠道相对缺少,政策制定及项目设计相对碎片化,青年的体验感和获得感不足,影响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另外,在志愿服务活动参与方面,笔者调查发现,大多数青年参与的频次及类型与海门区日常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相吻合,间接表明青年对参与志愿服务有普遍认同,但志愿服务内容较为单一、专业性较弱、激励不足等现象较为普遍,影响青年志愿服务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难以激励更广泛的青年志愿者参与。

三、南通市海门区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的优化路径

(一)提供优质服务助力青年立业

其一,深度挖掘青年就业岗位资源。一是突出政策引导。依靠企业吸引青年,既要注重存量,依托“千企大走访”等加大对现有企业的拓岗力度,做好资源梳理整合;也要创造增量,持续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引入更多优质项目和新质企业。二是注重政府兜底。积极发展直播电商、订单农业等新业态,引导青年助力乡村振兴。另外,可摸清底数,按照实际需求,开发人岗匹配的公益性岗位。

其二,完善陪跑青年制度体系。一是构建全周期青年就业支持体系。在不同关键时点,针对性施策。如就读期间,注重与院校合作培养,把学科建在产业链上;初次求职时,重点拓展工作机会的提供渠道;职业发展期间,强调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机制、晋升机制的完善;职业转换期间,加强社会

保障兜底及职业技能培训等。二是打造一体化青年创业服务体系。以青创社区等为载体,常态化征集并深度服务青年创业项目,制定并细化包含创业融资、场地扶持、导师辅导、项目孵化等帮扶措施的一体化服务清单。

其三,充分释放青年政策红利。一是线下统筹资源,推动责任落实精准化。有效打造“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驿站等,创建公共就业服务导师宣讲团,按照片区、街镇划分,提供政策宣介、职业指导、岗位推荐和培训或见习机会等就业服务。二是线上数字赋能^[1],优化信息对称性。依托 App、微信社群等,协同多部门数据,提供求职招聘、创业服务、补贴智办、劳动维权、政策咨询等“一张图”服务,推动由“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型。

(二)满足多样需求实现青年安居

其一,构建靶向青年住房政策。精准调研在海门青年的实际需求,按照分层、分类、分级的原则,完善“住房+购房”双轨制青年住房保障制度,普惠全体青年。如将房屋类型分为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按照青年的年龄、工资收入、婚育情况等分类,有针对性地提供实物、货币、信贷、首付比例等优惠补贴及政策支持。

其二,优化青年住房资源配置。一是突破“职住分离”难题。推动城区、乡镇租住资源置换,并结合需求打造快速通勤走廊,因地制宜打造“八小时”工作生活区。二是探索实现租购同权。多部门协同发力,在完善青年聚集住房区域内的教育、医疗、休闲娱乐等配套设施的基础上,推动实现社会资源共享^[2]。

其三,提升青年居住幸福体验。一是坚持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注重房屋装修

装饰及小区安全和物业服务,不断加强规范化、智能化管理。二是推动青年社区功能完善,使之更宜居。以青年保障住房小区为枢纽,嵌入学习培训、文化休闲、养老托幼等服务,创造性开展社群活动,拓展青年朋友圈。

(三)创新文旅场景丰富青年生活

其一,营造青春活力的县域文化。一是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立足海门区特色文化积淀,打造历史与现代气息交融的景观设施、文体空间,塑造有吸引力、有记忆点的青春海门 IP 符号。二是用好“金角银边”。鼓励打造口袋公园、青春市集等单元,为青年创设交友环境及机会,不断提升青年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其二,丰富青年生活消费服务业态。一是打造特色鲜明的青年新消费聚集地。推动购物中心等向城乡社区延伸覆盖,创建特色主题街区^[3],引入青年喜爱的文创产品、品牌首店等,鼓励夜经济多样化发展。二是促进数字技术与生活服务深度融合。创新打造“互联网+生活”场景,发展体验式消费、个性化定制服务等新业态。

其三,做优特色 City Walk(城市漫步)路线。一是设计精品路线。深入挖掘、利用张謇故里资源,摸排青年友好场景,以点串线,完善特色 City Walk 路线。二是做好宣传推广。挖掘青春推介官、青春主理人、青春观察员等力量,加大招募及培养力度,依托新媒体推出兼备海门特色和青年特色的宣传推介内容,特别是利用节假日和主题活动搞好各具亮点的文旅活动。

(四)尊重主体地位推动青年参与

其一,拓宽青年政治参与渠道。完善青年的利益诉求表达及回应机制^[4]。构建青年制度化参与的政党吸纳格局,通过定期召

开青年座谈会、开通青年专属热线等形式，保证青年的意见建议能够进入相关公共政策的决策、调整等环节并被积极采纳。

其二，深化志愿服务体系建设。一是打造特色志愿服务活动品牌。活动的组织开展要以社会实际需求为导向，使青年强化“学习与服务并重”的理念，注重结构性反思，提升青年的获得感和成就感。二是建立健全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加强对志愿服务组织负责人的专业培训，尽量使每个组织都能结合自身实际构建特色激励机制。三是加强青年志愿服务保障。加大经费支持力度，积极引入社会力量，支持志愿服务常态化开展。

其三，完善青年人才选拔使用机制。将青年发展与其对城市的贡献有机结合。完善青年人才库，建立青年人才举荐制度^[9]，综合考察、科学评价、大胆使用青年人才，探索建立功勋荣誉机制，助力广大青年被看见、被托举、有作为。

参考文献：

- [1] 聂伟,余燕琪.整体性治理与深圳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纵深实践[J].中国青年研究,2022(5):29-36.
- [2] 孙久文,蒋治.高质量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科学内涵与战略构想[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1-9.
- [3] 孟利艳,慕韶杰,张向东.主题街区模式下青年发展型街区的场所营造[J].中国青年研究,2024(10):40-48.
- [4] 聂伟,蔡培鹏.让城市对青年发展更友好:社会质量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1(3):53-60.
- [5] 谢素军.青年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探索[J].北京青年研究,2023(2):106-112.

责任编辑:马俊

(上接第 22 页)

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供有力的功能支撑。以新质生产力为视角,对法律服务聚集区的作用机理与推进路径等问题展开讨论,期待为新质生产力的拓展与深化研究带来多元视角的理论思考。

参考文献：

- [1] 吴俊鸿,林杨兰.探索商法融合 护航高质量发展[N].厦门日报,2024-07-12.

- [2] 王晗阳.天府中央法务区: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地标[N].四川法治报,2024-07-31.
- [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
- [4] 衣小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N].光明日报,2024-07-17.

责任编辑:马俊

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供给研究

——以江阴市“澄艺快递”为例

申静文

(江阴市委党校,江苏 江阴 214431)

[摘要]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江阴市通过“澄艺快递”项目探索出一条以需求侧驱动为核心的精准供给模式。本文基于实地调研与数据分析,探讨其“打造平台-需求识别-资源整合-精准配送-动态反馈”的运作模式,总结其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基层活力充分迸发、品牌效应日益凸显等成效,以期为其他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 精准化 供给 “澄艺快递”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1]2024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写入改革部署,明确要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2],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具体路径。江阴市以“群众需求”为公共文化服务导向,积极探索建立完善的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和供给机制,创新打造“澄艺快递”公共文化服务精准配送项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需求侧推动供给侧改

革的江阴实践。

一、问题的提出

江阴市委市政府历来重视文化工作,为了让广大群众充分享有标准化、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从 2008 年起,每年开展“文化走基层 服务进万家”主题惠民活动,平均每年为基层送戏送演出 85 场、送评弹 255 场、送图书 2.35 万册等。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公共文化的需求日渐呈现差异化、精品化趋势。传统的全民普惠式、填鸭式公共文化服务“供需错位”“大水漫灌”等问题日益凸显,对群众的吸引力也在大大下降。为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江阴市积极

收稿日期:2025-01-21

作者简介:申静文,中共江阴市委党校办公室副主任,高级讲师。

探索公共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读者需求簿到新书速递吧,从“三味书咖”城市阅读联盟到“滴答借书”网借服务,江阴市立足城乡特点,精准对接需求,不断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致力于给广大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江阴市多渠道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在全市实施公共文化服务精准配送,创新打造“澄艺快递”品牌,让公共文化服务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逐步建立起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相符合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二、江阴市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供给的创新实践

(一)江阴市“澄艺快递”项目概况

2022年9月,江阴市“澄艺快递”公共文化服务精准配送项目正式实施。“澄”代表江阴,“艺”是指以全民艺术普及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服务,“快递”意为将公共文化服务方便快捷地送到百姓身边。“澄艺快递”依托江阴公共文化云平台,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建立包含文艺演出、讲座导赏、展览展示、艺术普及、特色活动等五个

类别的项目资源库,由乡镇(街道)根据群众需求进行点单,通过“菜单式”点选和“订单式”配送的形式,将公共文化服务精准送到基层。

1.资源的标准化。“澄艺快递”公共文化服务精准配送的主要内容是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符合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各项要求,内容健康积极向上,具有公共性、公益性和普惠性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分为五大类型:文艺演出、讲座导赏、展览展示、艺术普及、特色活动(见表1),并对各个类型资源的公共文化属性进行标准化设置。

2.流程的标准化。“澄艺快递”公共文化服务精准配送由采、点、配、送、评五个环节构成。“采”是指采选文化服务产品和资源,发动具备提供文化服务能力的社会主体进驻平台进行项目申报,组织专家评审,选定优质项目,签订购买合同,完成入库;“点”是在文化产品上架后,由乡镇(街道)根据群众需求进行点单;“配”是由主管部门审核订单后,协调供需双方时间、场地、设施及人员等具体细节,确定实施方案的环节;“送”是项目提供方去点单乡镇(街道)开展服务的现场实施环节;“评”是文化服务配送

表1 江阴市公共文化服务类型一览

类 型	性 质	内 容
文艺演出	适宜在各类剧场剧院、文化广场、乡村戏台、街区商圈等场所进行的艺术演出	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专题综艺等
讲座导赏	公益性文化艺术讲座,专业性强、形式活泼、有互动性	人文历史、艺术导赏、民俗文化、生活美学、国学经典等
展览展示	公益性文化艺术展览展示	美术摄影、文物收藏、经典文史等
艺术普及	面向大众的文化艺术辅导培训,具有普及性	音乐舞蹈、美术摄影、戏剧曲艺等
特色活动	创新性、体验性和互动性	阅读推广、非遗传承、文化微旅等

完成后,现场观众根据平台二维码进行群众普评,项目提供方以及点单乡镇(街道)进行互评,主管部门综合评价情况,并结合平台上传的现场图片和文字信息给予最终评价,评价结果与项目经费结算以及今后项目采购挂钩。这五个环节紧密联系、环环相扣,在产品服务、设施网络和服务效能等领域形成需求侧、供给侧良性互动循环。同时,还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动态调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增强供给灵活度,提高群众满意度。

(二)江阴市“澄艺快递”项目运作模式

1.打造智慧化数字平台。对“江阴公共文化云平台”进行升级,并以此为载体,打造标准化、数字化智慧管理系统——江阴市公共文化服务精准配送平台。平台于2022年5月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由“前端”展示和“后台”管理组成:前端分为web端和移动端,供镇街管理员、服务提供商、用户群众使用;后台主要供文化单位管理员使用。通过平台完成采、点、配、送、评全流程管理。平台数据化管理、集散化配送,能直观地进行点单、查看配送信息、汇总市民需求、征集配送资源、后台流程管理、日常反馈监督、信息检索查询、配送数据分析、辅助决策等一系列工作任务,保障项目有条不紊地实施。

2.精准识别群众文化需求。在“采”这个环节,通过整合线下问卷、线上预约、文化消费行为等多源数据,建立动态需求数据库。通过对现有数据的统计分析,进一步摸清地域差异,全面梳理群众公共文化需求,按年龄、地域、文化偏好等划分需求层级(如中老年偏好锡剧、青少年热衷非遗研学等),采选相应的文化服务产品和资源。先“采”后“点”,精准识别群众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需求,满足群众期望。再通过平台“一键统一发布、分级用户管理、订单信息管理、大数据统计分析”等一系列功能,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点对点互通。

3.整合并优化配置供给侧资源。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采用公开申报和评审的方式,把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文化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担。动员其进驻平台进行项目申报,组织专家评审,选定优质项目,签订购买合同,完成资源入库。截至2024年4月30日,共96家供给主体申报各类文化服务项目171个。经江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专家评审后,确定2024年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119项^[3]。其中,既有中老年喜爱的锡剧、越剧、评弹等,又有中青年热衷的脱口秀、话剧、室内乐等,更有吸引青少年儿童的非遗展示、研学、魔术、杂技等。

4.应用物流按需配送。“澄艺快递”公共文化服务精准配送,由江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全面规划和组织协调,江阴市公共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具体负责实施,坚持科学规划、公开择优、规范管理、注重实效的原则,围绕“菜单式”点选+“订单式”配送模式,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行公共文化资源和服务产品的统一采购、统一管理、按需配送。2024年,“澄艺快递”项目共配送服务344场(见表2),惠及群众约52.6万人次。

5.注重用户评价反馈。活动结束后,用户对于整场活动的评价、对配送方的评价、对场地设施和现场环境的评价以及责任主体的整体评价都将被平台纳入大数据管理,作为服务验收和下次采购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时,还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动态调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如每年修订

表 2 2024 年“澄艺快递”项目配送情况

类 别	场 次	占 比	典 型 案 例
文艺演出	189	54.9%	锡剧、音乐话剧、部队文艺展演等
讲座导赏	67	19.5%	“七色花”智慧父母课堂、徐霞客人文讲座
展览展示	46	13.4%	《百家姓》少儿漫画展、丝路记忆摄影展
艺术普及	12	3.5%	非遗香橼制香、非洲鼓体验
特色活动	30	8.7%	亲子非遗竹编课堂、国潮故事小剧场

《公共文化服务配送标准》，新增“音乐旅游”“展演旅游”等融合业态，适应消费升级趋势增强供给灵活度，提高群众满意度。2024 年，服务满意度达 92%，在江阴市公共服务满意度测评中位列文化类项目首位。

三、江阴市“澄艺快递”项目成效

(一)服务效能显著提升

“澄艺快递”数字平台的使用让线上线下实现无缝对接，促进了整体流程的可视化、可控化，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通过项目实施，改变了原有资源单向配送的局面，建立全市公共文化服务精准配送网络体系，逐步形成公共文化资源大配送、大循环的新格局，更好地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有效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品质，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

(二)基层活力充分迸发

一方面，推动群众文艺创作不断繁荣。在“送”文化过程中实现“种”文化。“澄艺快递”项目的实施为全市众多有才艺的个人、机构、群众文艺团队提供了广阔的展示平台，也充分激发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热情。地区之间的文艺交流、市场竞争机制、评价反馈机制等又促使他们不断提升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当前已有三支群众文艺团队在参与“澄艺快递”的基础上达成合作，自主创排了大型音舞越剧《梁

祝》，成为江阴市群众文艺创作的新突破。

另一方面，推动城乡文化场馆建设。“澄艺快递”项目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推动了文化场馆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在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市镇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新建+改建”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推动公共文化阵地提档升级。创新拓展“三味书咖”“艺风书房”“艺风微书房”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实施“艺”熠生辉——澄艺空间珠链计划，将历史文博空间、名人文化空间、多彩文艺空间、红色文脉空间串珠成链，提升文化空间的艺术品位和服务品质，确保了文化资源有地可送、文化服务有处可供，极大提升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水平。

(三)品牌效应日益凸显

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润物无声的文化事业，也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为扩大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江阴市严格把控艺术生产环节，着力扶持群众文艺创作，以激发群众创造活力。比如连续多年举办“芙蓉花奖”评奖活动，每年评选出优秀的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等作品，建立优质文艺作品资源库，通过“澄艺快递”的形式在全市开展巡演、巡展，不断擦亮“芙蓉花奖”“锡剧进校园”等文化品牌，打造江阴市独具特色的文化 IP，加快推动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

顺应文化消费需求日益提档升级的趋势。

精心设计“澄艺快递”LOGO,加强品牌形象推广。举办“澄艺快递”公共文化服务产品采购展示大会,全面展示文艺演出、讲座导赏、展览展示、艺术普及和特色活动等各类入选项目,通过现场展演、线上直播等形式,实现供需对接,满足个性化需求,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性和透明度。充分利用公共文化云、微信、微视频等各类新媒体平台,传递活动资讯,提供资源服务。及时总结案例、宣传经验,将实践成果转化为理论成果。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澄艺快递”品牌效应日益明显,在群众中的知晓率不断提升,也吸引了更多优质社会主体参与申报。2024年,各类申报主体近百家,包含江苏省演艺集团锡剧团、西安话剧院、南京市话剧院等专业院团。2024年,在江苏省文旅厅《全省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案例汇编》中,“澄艺快递”的“需求侧驱动精准配送机制”被列为示范案例,其社会力量协同参与模式获全省推广。

四、江阴市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供给的启示

江阴市“澄艺快递”实践表明,公共文化精准供给需以需求侧改革为牵引,通过数字化工具、社会化协同、标准化建设重构供给体系。其经验为其他地区提供了“需求导向-技术驱动-制度保障”三位一体的改革范本,未来需进一步强化数据治理能力与区域协同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跨越升级。

(一)以社会需求引导供给改革

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供给的核心理念是将供给侧与需求侧结合起来,目标是实现供求精准匹配,确保公共文化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因此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供给

必须面向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文化需求。面对人民群众多种多样的需求,政府要发挥引领作用,以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线,过滤掉那些不合时宜、低俗落后的文化需求,提供积极向上、饱含正能量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另外,以此为基础着重在供给过程中下功夫,努力丰富供给的内容、改进供给结构,不断优化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二)以数字化赋能服务创新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指出“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基于国家战略导向与地方实践经验,数字化赋能公共文化服务可通过以下几方面推进:一是升级数字化基础设施。搭建文化体验大数据平台、智慧图书馆、数字文化馆、云博物馆等,加快资源数字化步伐。二是构建数字化服务网络。利用5G、AI、虚拟现实等技术活化传统文化资源。对一些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可通过数字技术实现跨时空展示,增强群众互动体验。三是在“文化云”平台上增加在线演出、艺术课堂等丰富多元的数字化产品,以供群众“点单”,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吸引力。

(三)以配套制度巩固发展成果

为形成公共文化资源有效配送、稳定循环的格局,江阴市制定了《江阴市公共文化服务精准配送(澄艺快递)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目标任务、工作分工、配送内容、工作流程和保障监督机制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申报准入制度》《精准配送点单制度》(下转第49页)

数字媒体时代下青年审美异化的具体表现、形成原因与矫正路径

李博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数字媒体时代的浪潮正在重塑当代社会的文化景观,尤其对青年群体的审美观念与行为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算法推荐驯化、资本逻辑操控、社交传播强化、心理机制驱动下,青年审美呈现出显著的异化趋势,表现为审美标准数字化、审美感知浅层化、审美取向功利化、审美认知趋同化。这种异化并非简单的审美偏差,而是从标准到感知、从价值取向到群体认知的全方位重构,导致青年审美从自由的精神活动沦为数据化、功利化与趋同化的工具化表达。急需通过提升青年审美素养、强化平台责任意识、加强政府监管引导、厚植文化育人沃土等矫正措施,重塑青年审美的本真体验和本真意义。

[关键词]数字媒体时代 青年 审美异化 矫正路径

审美异化是一个哲学、美学与社会学范畴的概念,指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原本自然、自由的审美活动被外在力量扭曲,导致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审美体验之间的本真关系被割裂,进而形成病态、扭曲的审美观念或行为。其核心是审美活动偏离了人类对“美”的本质追求,沦为资本、技术、社会规训等异化力量的附庸。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将青年

成长成才纳入治国理政与民族复兴的总体布局,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青年工作。青年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在青年,青年群体的审美态度、审美标准、审美方式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倾向,也折射出整个社会精神文明发展进步的程度。当今,数字媒体的迅猛发展重塑了社会的文化景观,尤其对青年群体的审美观念与行为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算法推荐、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技术力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嵌入式发展研究”(立项编号:22CMZ0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新时代民族地区乡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立项编号:21YJCZH090)。

收稿日期:2025-01-22

作者简介:李博,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量的驱动下,青年审美呈现出显著的异化趋势,审美标准从传统的人文价值向碎片化、符号化甚至功利化方向偏移。这种异化既体现了技术赋权带来的自由与多元性,也暴露了资本操控、文化消费主义对青年价值观的隐性侵蚀。数字媒体时代青年审美的异化,既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转型期的文化症候。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不仅关乎青年个体的精神成长,更涉及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未来方向,如何在技术狂飙中守护审美的本真性,成为数字文明时代的重要命题。

一、数字媒体时代下青年审美异化的具体表现

数字媒体时代的浪潮重塑了青年群体的审美认知体系,技术、资本与社交的融合催生一种新型的审美异化现象。这种异化并非简单的审美偏差,而是从标准到感知、从价值取向到群体认知的全方位重构,最终导致审美活动脱离人本核心,沦为数据化、功利化与趋同化的工具化表达。

(一)审美标准数字化

数字技术对审美标准的系统性改造,正在将人类千百年积淀的感性认知体系解构为可计算、可复制的数据模型。这一异化过程并非简单的技术应用,而是通过算法霸权、资本逻辑与社交规训的三重作用,将审美活动从主体性体验异化为客体化度量,最终导致青年群体在数字凝视中丧失审美自主权。其一,面部参数模板化。面部参数模板化标志着人类首次将生物特征转化为可编程的美学代码。人脸识别技术与图像合成软件的深度耦合,使“美”的定义权从文化艺术领域转移至数据工程师手中。黄金分割比例、三庭五眼间距等参数被编码为面部评估算法,动态的表情肌理与独特的气质神韵被简化为静态的几何图形。这

种技术理性主导的审美范式,不仅催生出千人一面的“AI建模脸”和网红脸,更在深层次消解了面容承载的文化记忆与情感叙事。其二,身材指标数据化。身材指标数据化则将身体从生命有机体降维为可优化的机械系统。智能穿戴设备与社交平台的监测网络,持续将体脂率、BMI(身体质量指数)等生物数据转化为社交资本,构成新的价值坐标系,使身体管理异化为数据竞赛。这种量化思维侵蚀了身体感知的完整性,使青年在追求“数据完美身材”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对身体自然状态的接纳能力,生命体验被切割为需要持续优化的技术参数。其三,颜值评分系统化。颜值评分系统化彻底暴露了数字审美体系的商品化本质。社交平台开发的虚拟评分系统,通过人脸识别算法生成“颜值报告”,将人类容貌置于数值化比较的竞技场。这种看似游戏化的互动机制,实则是将生物特征转化为可流通的数据资产。青年群体在彼此评分的数字互动中,不自觉地内化了“颜值即市值”的扭曲价值观,面部特征成为社交议价能力的直观体现,建立了容貌与个人价值的直接换算公式,陷入持续性的自我客体化审视,情感联结被异化为数据交换,审美活动彻底沦为数字资本的新型生产资料。

(二)审美感知浅层化

数字媒介的传播特性正在重塑人类审美感知的神经回路,将深度、连续、沉浸的审美体验解构为瞬时、断裂、虚拟的感官刺激。这种感知能力的退化并非简单的注意力分散,而是数字资本通过技术架构、内容生产与用户行为系统性压缩审美活动的时空维度,使青年群体的审美感知从“凝视沉思”退化为“滑动反射”,最终导致审美主体与真实世界的疏离。其一,三秒定律主导观看。短视频平台基于神经科学的注意力捕

捉机制,将“黄金三秒”法则编码为内容生产的铁律,迫使创作者将情感高潮前置、矛盾冲突极端化。这种反向驯化使青年形成“刺激-反馈”的条件反射,使多巴胺驱动的即时快感取代了艺术鉴赏所需的延时满足,使深度解读的认知能力在算法投喂的强刺激中逐渐萎缩,使审美活动从精神对话降级为神经应激训练。其二,碎片剪辑消解意境。碎片剪辑消解意境颠覆了审美体验的完整性。蒙太奇技术的滥用将叙事解构为孤立的“高光时刻”,通过跳跃式剪辑制造虚假的情感密度。古典艺术中“起承转合”的节奏美学被切割为信息碎片,宋画“可游可居”的意境被压缩成十五秒的转场特效。这种时空暴力不仅消解了艺术作品的沉思空间,更重塑了青年的认知模式。当审美活动失去时间纵深的滋养,艺术本应承载的历史厚重感与生命哲思便沦为转瞬即逝的信息尘埃。其三,滤镜依赖钝化观察。滤镜依赖钝化观察割裂了审美主体与物理世界的真实联结。美颜算法通过皮肤磨皮、背景虚化等技术制造的“超真实”幻象,正在重塑青年对现实的认知基准。自然光影的微妙层次被预设的“森系”“冷白皮”滤镜覆盖,晨昏线推移的细腻变化被标准化为色彩数值调节。这种视觉欺骗的深层危害,在于其使青年审美感知浅层化,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观察耐性,审美活动从“在场体验”异化为“数字仿真”。

(三)审美取向功利化

数字资本的增殖逻辑正在将审美活动异化为价值变现的流水线,青年群体既是被剥削的审美劳工,又通过点赞、消费、整容等行为再生产着压迫体系。这种功利化转向绝非偶然,而是算法操控、资本增殖与社交攀比共同构建的系统性压迫,使得审美价值被重新编码为可量化、可交易、可增

殖的数据资本,最终导致人与美的关系从情感共鸣异化为利益博弈。其一,流量变现主导创作。流量变现主导创作瓦解了艺术生产的本真性。内容创作者在平台流量分成的经济模型胁迫下,不得不将创作动机从自我表达转向数据优化,作品的完整性让位于“完播率”“互动指数”等算法参数,蒙太奇剪辑不再服务于叙事节奏而沦为留住用户的工具,文学意象被肢解为便于传播和吸睛的标签化符号。当艺术创作沦为流量竞赛的赌注,审美活动便丧失了超越性的精神维度,沦为数字工厂中可批量复制的文化快速消费品。其二,网红同款驱动消费。网红同款驱动消费暴露了审美自由背后的资本规训。电商平台通过“种草-测评-带货”的产业链条,将亚文化符号收编为标准化商品,制造出虚假的个性化选择陷阱。汉服不再是文化认同的载体而成为拍照打卡的限定皮肤,小众音乐被剪辑成短视频背景音后迅速泡沫化。更隐秘的控制在于算法制造的“信息茧房”,青年自以为在追逐独特风格,实则是在商业脚本预设的“网红同款”中循环消费。其三,颜值焦虑催生整容。颜值焦虑催生整容则标志着身体沦为资本增殖的战场。医美机构与社交平台合谋建构的“颜值经济学”,通过大数据精准投放容貌对比广告,将生物特征异化为社会竞争的硬通货。当鼻梁高度与求职成功率被算法强关联,下颌线弧度与婚恋价值被数据建模时,手术刀雕刻的不再是审美理想而是社会竞争筹码,护肤流程不再是自我关怀而是自我投资,资本通过制造永无止境的“颜值内卷”,成功将身体异化为需要持续更新的技术产品。

(四)审美认知趋同化

数字空间的全球化传播正在抹平人类审美实践的多样性,将文化差异重构为算法

可识别的标准化数据包。这种趋同化并非自然的文化交融,而是技术垄断、资本扩张与文化霸权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青年群体的审美认知从多元共生退化为机械复制,最终导致审美生态系统的物种单一化危机。其一,网红模板的病毒复制。网红模板的病毒复制揭示了算法殖民主义的文化暴力。社交平台通过协同过滤算法将局部审美偏好推演为全球性标准,形成“数据达尔文主义”,导致高互动内容自动获得指数级曝光,地域性审美特征在流量竞争中自然淘汰。这种文化替换被包装成“审美进化”的假象。更深层的危机在于,算法推荐形成的审美具有自我强化的侵略性,用户每一次对网红模板的模仿都在训练算法模型,最终使区域性文化基因在数字进化中彻底失活。其二,小众审美的霸权挤压。小众审美的霸权挤压暴露了亚文化收编背后的认知殖民。原本作为多元文化补充的小众审美,在社交媒体与资本逻辑的裹挟下,逐渐异化为新的霸权形式,通过标准化、符号化的传播机制,挤压其他审美表达空间,加剧青年群体的价值迷失与文化认同危机。如“盲盒丑甲”“审丑直播”等现象,通过刻意制造“丑”的独特性吸引关注,实则将审丑行为固化为流量密码,形成“越怪越红”的畸形评价标准。其三,地域特色的同质消融。地域特色的同质消融则标志着数字技术对文化根性的系统性剥离,将不同群体压缩为“平”的审美共同体,使多维度的地域文化基因被压缩为可量化的数据包,将地方性审美空间改造为可数字化复制的“网红景点”。例如,网红经济驱动下景点的商业化、模板化、符号化复制,将我国地域文化压缩为可快速消费的“视觉符号”与“体验模板”,使地域审美遭受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剥离^[1],导致青年审美体验的单一化和浅薄化。

二、数字媒体时代下青年审美异化的形成原因

数字技术、资本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度耦合,共同编织了一张精密而隐蔽的异化之网。这一异化链条的构建并非偶然的技术副作用,而是多重力量协同作用的系统性产物。算法推荐驯化认知模式,资本逻辑重塑价值标准,社交传播支配审美实践,心理机制消解审美自主,四重机制环环相扣,形成从技术操控到主体自缚的闭环系统,最终使青年审美从自由的精神活动沦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操控的数字商品。

(一) 算法推荐驯化认知模式

数字平台构建的算法权力体系正在对青年审美实施系统性规训,其运作逻辑远超出传统媒介的传播范畴,通过数据捕获、行为调控与认知重构将审美活动异化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操控的技术流程。青年在享受精准推送的便利时,不自觉地将审美主权让渡给数据模型;在追逐即时反馈的快感中,主动参与对自身感性的数据化改造;在成瘾性使用中,完成从审美主体到算法附庸的异化蜕变。

一是数据画像精准推送。数据画像精准推送实现了审美主体的数字化解构。跨平台行为追踪与多模态数据分析技术,将用户的审美偏好的数据编织成超越主体自我认知的“数字孪生”。这种数据化建模的吊诡之处在于,算法比个体更早预判其审美取向。当青年尚未察觉自己对某类艺术风格的兴趣时,推荐系统已通过微表情识别与交互模式分析完成内容预加载。这种精准投喂在提升内容匹配效率的同时,也在持续窄化审美视野的边界^[2]。

二是即时反馈塑造偏好。即时反馈塑造偏好重构了审美判断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点赞量的实时显示与评论区的情感共振,

使多巴胺分泌周期与内容刷新频率的精准同步,构成了数字空间的行为强化机制。这种条件反射式的评价体系,使原本不带功利目的、单纯因为觉得美的审美体验消失。更隐蔽的操控在于,平台通过调节反馈延迟与奖励概率,像用食物训练动物一样塑造用户行为,使青年审美偏好在不确定的奖励刺激中悄然偏移。

三是成瘾机制固化认知。成瘾机制固化认知完成了审美异化的闭环控制。短视频平台的连续刺激使审美活动退化为潜意识驱动的本能反应。这种认知固化在算法推荐的“相似内容强化”策略中达到极致,用户对某种审美风格的偶然点击,会触发系统递进式的同类内容推送,最终形成自我验证的认知茧房。当青年在日复一日的重复曝光中,将算法定义的潮流内化为自我审美标准时,福柯笔下的自我规训便以数字形态重生^[3]。

(二)资本逻辑重塑价值标准

资本增殖的暴力逻辑正在将审美领域改造成价值榨取的殖民地,青年群体在此过程中承受着三重异化:作为创作者,审美表达被数据标准肢解;作为消费者,审美趣味被算法推荐操纵;作为传播者,审美判断被流量指标绑架。当资本的触角渗透至审美活动的每个毛孔,使青年群体的审美实践从文化创造的主体退化为价值增殖的工具,最终完成从“人创造美”到“美剥削人”的异化逆转^[4]。

一是流量至上标准制定。流量至上标准制定标志着审美价值评判权的资本垄断。数据资本通过将点击率、完播率等流量指标确立为审美价值的终极尺度,完成了对美学标准的私有化改造。这种价值换算体系迫使内容创作者在选题策划阶段即进行“数据预判”。当流量成为审美创造的指挥

棒,艺术便丧失了对抗资本异化的批判性力量,沦为数字工厂中按需定制的标准化零件。

二是网红机构模板生产。网红机构模板生产表露了文化工业的数字化升级。网红机构通过解构爆款内容的元素组合,将审美创造降维为参数调节的技术操作,打造审美生产的标准化流水线。这种工业化生产造成的致命后果,是消解了艺术创作中的灵韵价值。更隐蔽的控制在于,网红公司通过签约创作者与算法推荐系统的深度绑定,使模板化内容获得流量加权,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机制,最终将审美多样性压缩进资本预设的模板牢笼。

三是商业营销概念包装。商业营销概念包装实现了消费主义对审美话语的殖民。资本通过创造“氛围感”“高级感”“松弛感”等伪美学概念,将商品属性偷换为审美价值。快餐店的塑料餐盘被赋能为“极简主义美学”,口红不再是化妆品而是“独立宣言”,运动鞋不仅是日用品更是“潮流态度”,这种概念包装的终极目标,是使青年群体将消费行为误认为审美实践,在“为美学买单”的幻觉中,完成了从审美主体到消费主体的身份转换。

(三)社交传播支配审美实践

数字社交网络重构了审美价值的生成机制,将私人化的审美体验转化为公共空间的表演竞赛。青年群体在此过程中承受三重异化:作为评估者,其审美判断被简化为点赞按钮的机械点击;作为模仿者,其审美选择被窄化为社群共识的被动接受;作为表演者,其审美表达被异化为数字人设的维护工具。该强化机制构建了自我循环的异化系统,最终导致审美判断从内在价值取向退化为外部关系维护的工具^[5]。

一是点赞评论量化价值。点赞评论量化

价值完成了审美评价的货币化改造。社交平台设计的交互系统,将康德所谓“无利害的愉悦”异化为可流通的社交货币。点赞数成为审美价值的通用度量衡,评论区的情感强度构成作品的意义标尺,转发量则演变为文化资本的硬通货。这种量化体系迫使青年将审美表达降维为数据竞赛,使审美活动从主体性体验退化为他者凝视下的数据表演,艺术本真的超越性在社交计量中荡然无存。

二是社群模仿引发跟风。社群模仿引发跟风暴露了审美自主权的群体性让渡。在社交媒体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青年群体的审美选择正经历着从“自我表达”到“群体复制”的蜕变。例如,小红书博主示范“纯欲风”穿搭、抖音达人带火“多巴胺配色”,引发无数青年争相效仿。算法构建的信息茧房将审美标准压缩成若干模板,青年看似在自由选择,实则是在算法筛选的“趋势榜单”与社群共识的双重夹击下,被迫接受预制菜式的审美方案^[6]。

三是虚拟身份倒逼表演。虚拟身份倒逼表演标志着审美实践的角色化蜕变。数字分身与现实人格的割裂,迫使青年在社交媒体中持续进行审美伪装。精修照片构筑的“颜值面具”、文案模板堆砌的“思想人设”、打卡定位伪造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虚拟剧场的表演道具。当审美活动完全服务于虚拟身份的维护时,主体便陷入永无止境的表演焦虑,真实审美需求被压缩进数字橱窗的展示框架。

(四)心理机制消解审美自主

数字技术对人类心理结构的重塑,正在将审美异化推向神经生物学的深层维度。这种驱动机制通过快感劫持、认同重构与焦虑制造这三重作用,将青年群体的审美活动异化为神经化学反应的奴隶,最终导

致审美主体从自由意志的承载者退化为心理机制的提线木偶。

一是即时快感替代深思。即时快感替代深思完成了审美认知的神经回路重构。多巴胺奖励系统与短视频瀑布流的精准对接,使“划动-刺激-分泌”的生理循环取代了传统审美中的沉思过程。碎片化内容通过高频刺激大脑神经的奖赏中枢,抑制深度思考能力,将艺术鉴赏降级为条件反射式的感官反应。快感机制对认知带宽的垄断,使青年群体丧失了对复杂美学的解码能力,审美活动沦为多巴胺经济的燃料^[7]。

二是群体认同消解个性。群体认同消解个性暴露了数字生存的身份困境。社交媒体创造的虚拟共同体通过神经镜像机制,将审美选择异化为生存策略的组成部分。边缘系统对社群排斥的本能恐惧,迫使青年主动修正审美偏好以换取群体接纳,即便这种修正违背内在真实。福柯笔下的“全景敞视主义”在此演化为神经层面的自我审查,这种心理异化的深层逻辑在于,数字身份的存在性焦虑已超越审美自主的需求,其动机并非审美表达,而是对社交孤立的防御性表演^[8]。

三是容貌内卷加剧焦虑。数字媒体时代,“A4腰”“巴掌脸”“精灵耳”“直角肩”等扁平化、单一化审美观念使青年群体在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中逐渐形成畸形的自我审视逻辑。数字社交媒体创造的视觉化生存模式,将个人价值与身体外貌深度捆绑,点赞量、评论数等即时反馈机制异化为审美权威的度量衡。算法推送的“完美形象”不断强化同质化审美标准,青年在信息瀑布流中陷入“永远不够完美”的焦虑循环,使原本多元的审美维度被压缩成标准化的参数体系,最终导致青年逐渐脱离审美的主体性,审美标准从主观感受异化为客观竞争^[9]。

三、数字媒体时代下青年审美异化的矫正路径

数字媒体时代的青年审美异化既是技术赋权的结果,也是文化失序的映射。其背后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多元碰撞,急需通过提升青年审美素养、强化平台责任意识、加强政府监管引导、厚植文化育人沃土等措施对审美异化予以矫正,在数字文明演进中铺设人性化发展的轨道,让技术回归服务者的本质,让美重新成为照亮心灵的自由之光,而非异化人性的数字化枷锁。

(一)提升青年审美素养

在数字媒体深度重构社会文化生态的当下,青年的审美素养已成为关乎个体精神成长与文明传承质量的核心命题。面对海量信息流裹挟下的审美异化风险,急需构建主体性觉醒的审美防御体系。一是加强审美教育,构建完整审美体系。学校应将审美教育纳入基础教育体系,不仅在美术、音乐等艺术课程中强化审美培养,更要在语文、历史等学科中渗透审美元素。同时,高校要针对不同专业学生开设多样化的审美选修课程,如艺术设计美学、影视美学等,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此外,社会也应积极开展审美教育活动,如举办艺术展览、音乐会、戏剧演出等,营造良好的审美氛围,让青年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审美素养,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和科学的审美标准^[10]。二是培养批判性思维,提高信息甄别能力。数字媒体时代,信息海量且繁杂,青年必须具备批判性思维,才能在众多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学校和社会应加强对青年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通过开设逻辑思维、信息素养等课程,教导青年如何分析信息的来源、真实性和价值取向。例如,在网络上看到某一流行的审美观点或文化现象

时,引导青年思考其背后的推动因素,是商业营销的炒作,还是真正具有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同时,鼓励青年积极参与讨论和交流,在思想的碰撞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判断,避免盲目跟风,从而能够理性地看待数字媒体中的各种审美信息,不被低俗、异化的审美内容所左右^[11]。三是注重自我反思,树立正确的审美取向。青年要学会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自我反思,审视自己的审美偏好和行为。定期回顾自己在数字媒体上的浏览记录和关注内容,思考这些内容对自己审美观念的影响。如果发现自己过度沉迷于低俗、同质化的审美内容,要及时调整,主动寻找更具深度和内涵的艺术作品和文化资源。同时,树立正确的审美取向,以积极、健康、向上的审美标准来要求自己,追求真、善、美的统一。

(二)强化平台责任意识

在数字技术重构传播格局的当下,平台型媒体已成为内容生产与分发的核心枢纽。面对算法茧房加剧审美极化、低俗内容消解文化价值、AI生成物冲击创作伦理等现实挑战,平台作为数字生态的“守门人”,急需从流量至上转向价值引领,重构算法推荐的价值坐标、筑牢内容审核的伦理防线、构建优质内容的孵化机制。一是优化算法机制,打破信息茧房。平台应改变单纯以用户点击量、浏览时长为导向的算法推荐机制,建立用户反馈机制,根据用户对不同内容的评价和反馈,及时调整算法,提高内容推荐的精准度和丰富性,在推荐热门短视频的同时,也要适当推荐一些经典艺术作品、优秀传统文化纪录片以及其他一些高质量的原创视频等,让青年在接触自己感兴趣内容的同时,也能接触到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审美资源,打破信息茧房的限制。二是加强内容审核,抵制低俗审美。平

台要建立严格的内容审核制度,配备专业的审核团队,对用户上传和发布的内容进行全面审核。制定明确的审核标准,对于低俗、暴力、色情、虚假等不良内容坚决予以屏蔽和删除,对于存在审美异化倾向的内容进行引导和规范。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审核,提高审核效率和准确性,及时发现和处理不良内容,营造一个健康、积极的网络内容生态环境。三是主动引导审美,传播优质内容。平台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主动承担起引导青年正确审美的社会责任。积极挖掘和传播具有高审美价值的内容,与文化机构、艺术团体、创作者合作,推出一系列优质的审美内容产品。例如,视频平台可以制作和播放关于传统艺术、经典文学、世界文化遗产等方面的纪录片和专题节目;音乐平台可以推荐经典音乐作品、优秀的原创音乐,举办线上音乐演出和交流活动。此外,平台还可以通过举办审美评选活动、开设审美专栏等方式,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激发青年对美的追求和创造热情。

(三)加强政府监管引导

数字时代的文化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格局,算法黑箱侵蚀审美共识、流量经济催生审丑狂欢、技术赋权放大价值撕裂等问题相互交织,急需构建适配数字文明的新型治理框架。政策法规作为数字生态的定盘星,其完善程度直接决定着青年审美发展的健康走向。一是健全法律法规,规范数字媒体发展。政府应加快制定和完善与数字媒体和青年审美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数字媒体平台、内容创作者、用户等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规范数字媒体市场秩序,对数字媒体内容的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规范,保护青年的审美权益。同时,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

及,提高数字媒体从业者和青年用户的法律意识,让大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良好的数字媒体环境。二是加强监管力度,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建立专门的数字媒体监管机构,加强对数字媒体平台的日常监管和定期检查。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网络内容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审美异化问题的内容及平台。对于违规的平台和内容创作者,要依法、及时予以处罚,提高其违法成本。同时,建立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公众参与数字媒体监管,通过设立举报热线、举报平台等,及时收集和处理公众的举报信息,形成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平台自律相结合的长效监管机制^[12]。三是加大文化投入,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政府要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建设更多的公共文化设施,为青年提供丰富的线下审美体验场所。同时,利用数字技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打造线上文化平台,提供海量的优质文化资源,让青年随时随地都能接触到优秀的文化作品和审美教育内容。此外,还要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如文化艺术节、青年艺术大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动等,为青年提供展示自己审美创造力的平台,激发青年对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的热爱,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审美取向。

(四)厚植文化育人沃土

面对数字媒体时代下青年审美的异化,唯有厚植文化沃土,方能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重塑精神标识,在文明互鉴中培育兼具民族特质与人类情怀的审美品格,为青少年构筑抵御审美异化的精神屏障。一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传统审美价值。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智慧。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深入挖掘传

统审美文化中的精华,将其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体系。在教育教学中,要增加传统文化课程的比重,让青年了解传统艺术、文学、建筑、服饰等方面的审美特点和价值;在文化创作中,鼓励创作者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创作出具有传统文化内涵和现代审美风格的优秀作品,让青年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对优秀传统审美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二是倡导多元文化,促进审美交流融合。数字媒体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碰撞。要倡导多元文化理念,鼓励青年接触和了解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审美交流和融合。在教育中,开设多元文化课程,介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艺术、文学、习俗等方面的审美特色,培养青年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审美能力;在文化传播中,积极引进国外优秀的文化作品,让青年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拓宽审美视野,丰富审美体验,形成开放、包容的审美心态。三是营造健康文化生态,引导审美价值取向。媒体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宣传和弘扬积极向上的审美观念,形成正确的审美舆论导向。文化企业要增强社会责任感,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创作和传播具有高审美价值和思想内涵的文化产品,抵制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唯一目的的低俗文化生产。同时,要加强对青年文化的研究和引导,关注青年在数字媒体时代形成的新兴文化现象,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审美问题,通过合理的方式进行引导和规范,促进青年审美观念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罗兰.青年网络审美“异化”的文化表征、成因与对策[J].深圳社会科学,

2025(1):116-123.

- [2] 陈世华,余思乔.走出效率至上的审美异化:短视频的加速逻辑与减速调适[J].南京社会科学,2023(12):93-103.
- [3] 刘海生,潘建红.智媒时代青年功利主义思想倾向的生成及引导[J].思想教育研究,2022(6):101-106.
- [4] 陈芝宇.异化与重塑:数字媒体时代视觉审美现状探析[J].理论导刊,2022(7):61-68.
- [5] 陈东辉,王宇婷.泛娱乐主义思潮下青年审美能力的隐忧与解决策略[J].理论导刊,2022(8):91-98.
- [6] 郑志康.网络文化消费主义对青年精神生活的侵蚀与应对[J].新疆社会科学,2023(3):115-124.
- [7] 李旭.媒介技术视野下的微文化审美品格与审美悖论[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2):107-115.
- [8] 张寒.“风”与“疯”: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的审美狂欢[J].中国青年研究,2023(1):21-27.
- [9] 战迪.论“看脸时代”的青年审美迷失[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10):101-106.
- [10] 李鑫磊,林樾.青年审美的时代融合与再造——以主旋律影视作品为分析视角[J].中国青年研究,2023(1):28-34.
- [11] 梁钦,沙星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青年数字素养生成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24(4):124-129.
- [12] 孙宇.论算法个性化定价的算法规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76-85.

责任编辑:马俊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 组织建设思想论析

王也 周成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在建立和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涉及的核心要素进行深入思索,提出了一系列极具科学性的思想主张。他们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根本保障;完善组织体系,夯实党的组织基础;加强思想建设,为党的组织建设凝心铸魂;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党组织运行。系统梳理、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的思想,对于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无产阶级政党 组织建设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并将其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大“把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作为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写入党章”^{[1][12]},进一步凸显了组织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者,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组织建设”这一概念,但他们围绕

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涉及的核心要素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系统阐释。新征程上,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思想,对于加强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提高党的组织力、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根本保障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仅关系政党内部的上下协同与团结一致,也决定了组织建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 2024 年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科研创新项目“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双向互动的内在机理探析”(立项编号:2024YB008);2024 年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校级课题“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路径研究”(立项编号:2024NLKY011)。

收稿日期:2025-01-20

作者简介:王也,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周成,南京旅游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

设的性质、方向等。

第一,党的领导决定组织建设的本质特性。政党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代表特定阶级或阶层利益。政治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党的政治属性是党性的集中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时就已深刻意识到政治独立的重要性,强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2]52}。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不仅要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政党,更重要的是确立领导核心地位。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明确指出,“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协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2]193}。正是拥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无产阶级政党才能作为一种“正规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3]353}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在政党联合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4]578}。如果“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5]484},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性质轻易发生改变,那么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也就无从谈起了。

第二,党的领导为组织建设指明前进方向。政党把获取国家政权和实现政治纲领作为其活动的基本指向和奋斗目标。无产阶级政党紧紧围绕着这一政治目标推进组织建设,致力于“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5]228}。在组织建设的总体目标中,党的领导是推进组织建设的核心,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引。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

产阶级要“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2]53}。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需要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充分组织和动员广大工人,推动工人斗争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彻底改变广大工人被压迫、被奴役、被统治的命运。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巩固政权成为当务之急,仍然要坚持党的领导,汇聚全党破旧立新的强大力量。

此外,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上,还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自第一国际成立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不仅严重破坏党内团结,还挑战政党权威,阻碍政党组织建设的发展。对此,恩格斯尖锐地批判巴枯宁政府的真实目的是“不希望总委员会有任何权威”^{[4]375},进一步揭露其行为的实质是“企图先夺取这个组织的领导权,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就力图破坏这个组织”^{[6]371}。恩格斯多次阐明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性,在《论权威》中通过航船遇险案例,指出“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5]337}。不仅如此,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强调“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4]372},凸显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从根本上关乎党的前途命运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走向。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构建“有成效和坚强的组织”^{[7]540}的保障,使组织凝聚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综上所述,党的领导贯穿于党的组织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是组织建设的“根”与“魂”。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坚守组织建设的政治性质、政治方向、政治原则,进而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实现政党的奋斗目标。

二、完善党的组织体系,夯实党的组织基础

组织优势是无产阶级政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一把“金钥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通过完善党的组织体系和夯实党的组织基础可以不断增强组织功能和政治功能。

早在无产阶级政党创建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将构建严密的组织体系作为一项基本内容。《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明确指出,“组织机构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构成”^{[8]572},并进一步规定各级组织的职能,“总区部是本省各区部的权力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8]574},特别是对各级组织之间的关系作出具体表述,“每个区部至少每两个月向总区部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每个总区部至少每三个月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8]575},“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8]574}。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欧洲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对党的组织体系作出进一步完善,删去了原组织体系中的“总区部”,调整为“支部、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进一步规范了组织之间的关系,如“支部只跟区部直接联系,区部只跟中央委员会直接联系”^{[4]745}。之所以作出如此改变,是为了建立一个结构严密、职能清晰、运行高效的组织体系。组织体系越严密,党的各级组织之间越能有机衔接,就越能集中无产阶级力量,进而为革命运动的胜利提供组织保证。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支部的构成及运行机制作出具体阐述,明确指出,“支部的组成至少三人至多二十人”^{[8]573}“支部至少须由居住同一地区的三人组成”“至少每一个月向区部作一次书

面报告”^{[4]745},这里的“支部”便是党的基层组织的最早形态,是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随着革命运动的持续推进,马克思恩格斯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给予极高的重视,并围绕“如何夯实党的组织基础”进行理论探讨。一方面,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党的组织体系的“神经末梢”,是落实党的组织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面对“个别的区部和支部开始放松了,甚至渐渐地中止了自己同中央委员会的联系”^{[2]188}的境况,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党的基层组织处在组织体系的“最末端”,必须夯实基层组织这一“地基”,将其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确保上级党组织决议真正落地落实,使工人阶级政党“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2]189},否则无产阶级政党便丧失“自己唯一巩固的支柱”,将会处于“完全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控制和领导的地位”^{[2]189}。另一方面,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无产阶级政党战斗力的基础。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农民阶级的重要性。在他们心目中,无产阶级政党不应只注重党组织内部的凝聚力,还应当联合农村无产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合力。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高度关切农民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9]591}。无产阶级政党正是通过基层党组织这一有效载体构建良好的党群关系,不断深入群众,“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5]156},同农民联合,壮大革命队伍,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增强反抗剥削与压迫的战斗力和战斗力,有力地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党的全面领导及其各项工作部署依托于党的组织体系。只有这样,无产

阶级政党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构建坚强的堡垒。

三、加强思想建设，为党的组织建设凝心铸魂

思想建设关乎一个政党能否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铸牢共同理想信念，它为组织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精神动力。

第一，以科学理论为根本遵循制定党的纲领。无产阶级政党需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制定党的纲领，以实现全党思想的统一。科学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12]24}，“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8]465}，是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体现党组织的理论水平和成熟程度。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第一部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纲领，《共产党宣言》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思想统一奠定了基础。《哥达纲领批判》进一步深化了先进理论的引领作用。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在对拉萨尔错误观点进行逐条分析和批判中，捍卫了党的组织思想。1875年3月，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进一步说道：“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5]410-411}此外，制定党的纲领还要紧密联系实际。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党的纲领是“能满足一切科学要求并包含有明确具体要求的纲领”^{[9]592}，“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11]425}。这就要求党的纲领要与工人运动的实践紧密结合，“如果不同人们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即使它在理论上是基本正确的，那也毫无用处”^{[3]78}。

第二，以党内教育为主要抓手深化理论武装。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党内成员在思想上仍不同程度地残留着资产阶级思想。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参加无产阶级运

动“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5]484}，“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10]383}，充分体现了他们在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方面的坚定立场。在实践探索中，无产阶级政党以党内教育为主线深化理论武装，“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11]19}，这里的“教育”就是理论教育，是保持思想纯洁的有力武器。党员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存在差异，随着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发展，有些党员意志涣散、思想松动，严重影响了党内生活的有序运行。对此，抓实党内教育、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党员思想觉悟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党员干部通过自觉研习马克思主义，增长“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9]86}，“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彻底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2]219}，最终“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52}。这既是党员干部的责任，也是加强思想建设的关键一环。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党内理论学习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思想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关于如何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恩格斯回答道：“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4]560}。

第三，在批判错误思潮过程中巩固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科学社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冒牌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问题，同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进行斗争。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社会主义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真理“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12]69}。在应邀参与正义者同盟改组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将科学社会主义视为组织革命队伍的思想基础，同一切封建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

“真正的”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想交锋与论战,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和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以魏特琳演讲为例,马克思指出“如果没有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的学说来号召工人,那就等于玩弄空洞虚伪的传教把戏”^{[13]45},通过批判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在国际工人协会时期,面对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和杜林主义等随意阉割或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冒牌货”,马克思恩格斯以蒲鲁东主义为例进行剖析。“越是深入地考察蒲鲁东主义,就越能看出它的反动性”^{[15]267},拨开层层迷雾,最终发现“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4]52}。揭露了这些错误思潮的实质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并表明“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作出让步,它就会丧失自己在历史上的领导地位”^{[14]443}。针对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成不变的教条的错误观点,恩格斯在《致威尔纳·桑巴特》中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4]691},要根据客观实际来运用理论,而不是机械地僵硬地学习。

总之,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组织建设的“铸魂”方式。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制定党的纲领、抓实党内教育、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等有力措施构筑思想根基,增强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

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12]40-41},不仅在于党员数量的增多、组织规模的扩大,更在于组织建设质量的提升。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组织建设质量与干部队伍质量密不可分,“具有宣传的能力和热情、坚定不移的信念、革命的活力”^{[14]744}的高素质

党员干部队伍是组织的核心力量。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围绕如何锻造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展开重要论述。

第一,锤炼党员干部的政治品格。政治品格是党员干部的内在规定性,政治标准是选拔干部的首要标准。抓好选人用人这一环节,就是抓住干部队伍建设的“牛鼻子”。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严格要求盟员对党忠诚,同时规定“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15]229},旨在强调自觉拥护党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要求严把入党关口,将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拥护党组织的人吸纳到党组织中来,防范投机分子进入党组织,从源头上保证干部队伍的质量。之后,恩格斯还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始终保持纯洁的政治品性。他指出,“这些人经常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面前出卖真正的党的原则”^{[15]523}。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党员干部要始终对党忠诚,在同资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无论面对多么艰苦的条件,都应是“无所畏惧的和忠实可靠的先进战士”^{[14]94},而不能沦落为丧失党性修养的阴谋家、叛徒。

第二,增强党员干部的本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员干部是组织建设的主体,其能力素质是党组织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因此,在建立和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应把握干部履职尽责的内在规律,系统推进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其一,深入实践。针对“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12]478}这一脱离实践的做法,恩格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批评到,党员干部不应该是只会空谈的理论家,而要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19]86},在实践历练中积累丰富的斗争经验。其二,走进群众。党员干部除了深入实践

外,还要走进群众,向群众学习。“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9]86}。在向工人学习的过程中,党员干部能获得群众的支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其三,注重人才培养。在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党组织结合革命形势注重选拔和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例如,“脑力劳动无产阶级”^{[9]508}、“具有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确,风格要更好一些,知识也要更丰富些”^{[8]304}的人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并肩战斗。正如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中所言:“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9]508}

第三,强化干部队伍的管理。组织建设中,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决定了他们更容易被腐蚀,可能最终酿成“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9]288}的悲剧。无产阶级政党要以严格的纪律约束党员干部的言行,确保他们不变质、不变色。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指出,所有盟员“始终力求做到以原则为准绳,而不是以这个人或那个人为准绳”^{[16]420}。这表明,党组织反对任何个人搞特权,凌驾于组织之上。恩格斯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在《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中强调“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3]76-77}，“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是进行批评”^{[3]37}。这些论述说明党内杜绝权力崇拜、个人崇拜。在实践中,为优化干部队伍的生态,剔除损害党组织肌体健康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

作”^{[5]196}。这些思想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规矩意识,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注重自我管理。

五、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党组织运行

科学的组织制度不仅能规范党员行为、明确各级组织职责,还能提高党组织工作效率和质量。马克思恩格斯主张通过建立一系列组织制度确保组织内部“根据民主的原则进行管理”^{[17]709},推进组织建设日益程序化、规范化。

第一,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的本质特征。1847年,从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时起,马克思恩格斯就把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一项根本性组织制度,规定“代表大会是同盟的立法机关”^{[14]745}，“总部向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报告工作”^{[8]574},确立党的代表大会在组织机构中的最高地位。为维护党的代表大会的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党的代表年会制来讨论和决定党内重大事项,同时规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18]535}，“全协会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一年来活动的公开报告”^{[5]227}，“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19]502},确保党内各项工作严格按照党的制度有序开展。此外,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发扬党内民主的基本形式。在指导第二国际的革命实践中,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不隶属于某个人或某部分人,而是重视党员自身意愿的充分表达,强调“让全党哪怕一年有一次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一般说来也是重要的”^{[13]482}。

第二,党内选举制度。党内选举制度是党内民主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11]278}具体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

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指出,“所有盟员一律平等”^{[16]419},所有盟员都是通过选举产生,“每个支部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16]420},“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不少于五人,由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区的区部委员会选出”^{[16]421}。同时,党内选举制与任期制、罢免制紧密结合,“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一年后必须重新当选,方可连任,否则由他人替换。每年九月进行选举。选举人如认为自己的担任公职的人员执行职务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可随时召回”^{[16]422},这一做法最大程度保障了党内民主。之后,在指导国际工人协会时,马克思恩格斯在贯彻党内民主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党内选举制,规定:“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会员有参加选举全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被选为代表的权利”“在代表大会上每个代表只有一票表决权”^{[18]538},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党员的民主权利。

第三,集体领导制度。纵观马克思恩格斯建党管党的实践过程,他们都十分警惕组织内独裁专制和个人专断的出现,一再强调集体领导制度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集体领导制度最显著的特征在于“集体”二字,具体表现为:从各级党组织构成角度入手,重视“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专制”,从基层到中央各级党组织完全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制度。从会议决策角度分析,重视“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独裁”,同盟必须经常召开各种会议并开展集体讨论,在制定决策时,要维护集体的意见。通过这种集体讨论的方式,吸收不同的见解,促进党内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从组织原则角度来看,重视“集体智慧”而不是“个人专断”,1864年,马克思恩格斯制定了“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汇集全党智慧,强调了组织决策的科学性,对个人权力起到较强的约束作用。

为确保集体领导制度的落实,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不仅拒绝担任总委员会的主席职位,还建议取消该职位,改为轮流制,这一举措有利于减少领导者谋求特权的可能性。

第四,党内监督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的核心在于对权力的制约,确保党员之间、党组织之间、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行为规范,是党内拒腐防变的有效措施。权利与义务是对立统一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18]535},任何党员既是监督者也是被监督者。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构建一种双向互动的监督机制:一方面,自上而下的监督,譬如盟员要“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区部或独立支部可以暂令个别盟员离盟,但必须立即上报上级机关备案”^{[18]576};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监督,如中央委员会要向代表大会负责,接受代表大会的监督。1869年8月,在马克思恩格斯党内监督思想指导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起专门负责监督的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该机构的设立显著提升了监督的权威和效率,推动党内监督从理论走向实践。

总之,加强制度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的内在要求。发扬党内民主的关键在于构建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以具体的组织制度为支撑的组织制度体系,进而持续提升党的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人间的普罗米修斯[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 责任编辑:徐书琴

(上接第 32 页)

《精准配送工作评估办法》《监督评估制度》等配套制度。从“澄艺快递”实施情况来看,配套制度的保障系统性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规范性、可持续性与社会效益,有效推动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数字赋能”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四)以多元协同激发社会活力

社会组织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是政府和市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有力补充。积极构建共商共建机制,鼓励社会精英参与供给,利用自身优势组织开展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建立激励机制,政府可设立专项资金,对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表现优异的社会组织给予嘉奖;引入竞争机制,激发供给主体的潜力,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质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N]. 人民日报,2018-08-23.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
- [3] 2024 年江阴市公共文化服务精准配送(澄艺快递)拟购买项目公示[EB/OL]. (2024-05-16) [2025-01-10]. <https://www.jiangyin.gov.cn/doc/2024/05/16/1281284.shtml>.

责任编辑:徐书琴

高校思政课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的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

张荣康

(桂林理工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随着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趋势。高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探索其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该教学模式呈现从“混合式教学”向“融合式教学”发展的趋势,但在实施过程中面临技术衔接梗阻、师生思维固化、资源整合低效等问题,亟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破解,以提高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推动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 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 教学模式 实践进路

在数字经济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的 21 世纪,全球科技创新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推动产业格局重构和经济形态的嬗变,这种深刻的时代变革对教育生态系统提出了迫切的革新要求^[1]。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数字技术的集群式突破,不仅重构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基础逻辑,更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注入了强劲动能。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对此作出前瞻性响应:2018 年《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率先提出“三全两高一大”^[2]的战略框架,标志着教育信息化进入智能升级新阶段;《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进一步明确“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3]的战略导向,将

技术赋能教育上升至国家的现代化治理层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通过“深入推进智慧教育”^[4]的政策设计,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数字经济形成战略耦合;党的二十大创造性地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5]的重要命题;2024 年全国教育大会关于“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6]的重要部署,从顶层设计层面构建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立体化政策图谱。在此背景下,对照《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关于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的要求^[7],高校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其线上线下教学模式探究不仅承载着破解传统教学模式的时空限制、重塑思想

收稿日期:2025-01-23

作者简介:张荣康,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政治教育生态的时代使命,更成为检验教育教学数字化战略实施效果的重要观测维度。

当前高校思政课线上线下教学模式呈现由“混合式教学”到“融合式教学”的发展趋势,国内外学者关于融合式教学(Blended Learning 或 Hybrid Learning)的定义在不同研究背景下有所差异,但均强调通过结合不同教学模式、技术或学科内容,提升学习效果。进一步而言,“融合式教学”是更高层次的混合式教学,它是对所有教学要素进行优化组合的一种教学方式,更强调根据学习目标重新设计教学要素,以学习成果为导向,更注重实现个性化、深层次的学习^[8]。基于此,本文探讨其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提出实践进路,以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的融合式发展,助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一、高校思政课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的现实挑战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思政课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在提升育人实效、推动精准育人的同时,也面临技术衔接梗阻、师生思维固化、资源整合低效等多方面的现实挑战。

(一)技术衔接梗阻

高校思政课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在推进过程中,面临诸多技术局限。其一,从技术实现的角度看,突出表现为软硬件设施建设滞后。当前技术水平尚不能完全满足数字技术在思政课中的应用需求,数据分析难以处理海量、多样、复杂的数据要素,且数据算法模型缺乏针对性,可能导致分析结果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进而误导决策^[9]。此外,智能技术与思政课教学的深度融合衔接也面临挑战,如怎样更好地将“智

能学伴”、虚拟现实技术、泛在智能技术等融入思政课教学、提升教学效果,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二,从系统兼容性角度看,数据、算法与算力作为数字思政的核心技术构件,其跨平台兼容性尚未解决。各系统独立运行形成“信息烟囱”,导致线上线下教学数据难以互通,既阻碍了学习轨迹的全周期追踪,也削弱了教学决策的精准性^[10]。由于部门壁垒、技术障碍、利益冲突等因素,不同主体间的数据标准不一,难以有效整合,形成“数据孤岛”,影响数据的高效利用。同时,思政课数字化教学平台与现有教学资源库、网络教学中心等平台的对接存在障碍,难以实现数据的良好交互和共享。不同智慧课堂平台之间的兼容性不足,不仅影响跨平台教学的顺利开展,也增加了教师备课与教学难度。其三,从用户体验角度看,技术复杂度高、界面不友好、操作繁琐等问题降低了学生的使用意愿和体验感。思政课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可能因技术复杂度高而导致学生接受度低,影响教学效果。

(二)师生思维固化

高校思政课融合式教学面临师生传统教学习惯的双重制约。其一,教师层面。长期形成的“知识权威者”角色定位,导致部分教师难以适应“学习引导者”的角色,出现“穿新鞋走老路”现象,如将线上教学简化为录播课程,忽视学情数据分析与教学策略调整。同时,融合式教学要求教师完成大量数字平台工作,给教师带来沉重负担,影响教学积极性。此外,由于高校思政课学生规模庞大,教师在数字平台上需耗费大量精力处理作业存档、小组讨论记录等事务,使数字技术从辅助工具变成了负担。从更深层面看,传统教学习惯还导致了教学

模式的固化,教师难以摆脱传统讲授式教学的束缚,对新技术应用的积极性不高,导致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其二,学生层面。不少学生习惯于“听讲-记笔记-应试”的被动学习模式,面对融合式教学提出的自主探究、协作学习等要求时,普遍存在目标迷茫、时间管理失控等问题,线上学习行为数据反映出的“刷课”现象即为典型表征。

(三)资源整合低效

在高校思政课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实践中,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与整合不足,已成为制约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瓶颈。其一,资源开发呈现“低水平重复”与“高质量短缺”特征。当前思政课数字资源建设陷入“生产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怪圈,不少思政课程资源库存在内容同质化现象,现有资源多停留于教材搬家层面,同一主题的课件、视频在不同平台反复出现,而深度融入虚拟现实(VR)、人工智能交互技术等沉浸式教学资源较少。其二,资源整合效率低下形成“信息孤岛”。当前思政课数字资源库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区域性平台多、全国性枢纽少;碎片化资源多、系统化方案少;封闭式存储多、开放式共享少。各平台资源自成体系,缺乏统一元数据标准,导致检索困难。

二、高校思政课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的实践进路

(一)突破技术难题,保障线上线下无缝衔接

高校思政课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需构建技术赋能闭环。其一,加强软硬件设施建设,夯实技术底座。以《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为指引,完善智慧教学设施,依

托5G、人工智能(AI)、区块链等技术,开发思政智慧教学云平台,实现教学场景的深度互联与数据互通,保障数字技术高效、准确地服务于思政课教学需求。同时,优化智能终端配置。推广配备触控屏、人脸识别摄像头、环境传感器的智能教室,实现课堂行为数据自动采集;为学生配备轻量化的学习终端装备,支持跨场景无缝切换。此外,强化数据安全防护。采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分布式存储网络,实现教学资源版权溯源与访问权限动态管理;引入联邦学习框架,确保学情数据在跨平台共享时的隐私安全。其二,提升系统兼容性,打破数据孤岛。统一技术标准,制定涵盖数据格式、接口协议、认证体系的“思政课融合教学技术规范”,支持跨平台资源调用,推动全国高校平台互联互通。同时,开发智能中间件。利用微服务架构搭建数据中台,通过语义解析引擎将异构数据(如MOOC视频、虚拟仿真实验、课堂录播等)转化为标准化知识图谱,实现跨系统资源智能聚合。其三,提升用户体验感,优化教学交互。建议采用“低代码+可视化”设计理念,开发“一键开课”“智能分组”“自动录播”等功能模块,降低师生技术使用门槛。同时,增强交互沉浸感。应用AR、VR等技术创设沉浸式学习场景,学生可通过手势交互参与虚拟实践;引入AI虚拟助教,实时解答学生提问并生成学习报告,最终实现技术衔接无缝化、教学服务智能化、学习体验个性化的目标。

(二)打破思维定式,塑造新型教学习惯

高校思政课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需通过主客体相互转换重塑教学主体习惯。其一,教师层面。应加强对教师数字素养、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训,帮助教师适应“学习引导者”角色。通过定期举办工作坊、专家

讲座、研讨会等,分享融合式教学的成功案例与有益经验,激发教师对新技术应用的积极性。教师要善于借助数字时代的优势,全面系统学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同时,要减轻教师在数字平台上的工作负担,提供便捷的教学工具与充分的资源支持,使其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学策略的设计与调整中。其二,学生层面。应通过引导与激励,培养学生自主探究与协作学习的能力。通过设立线上学习小组、开展项目式学习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力,促进其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同时,加强线上线下的即时反馈与互动氛围营造,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感和参与度。其三,课堂层面。通过设计“虚拟导师+人机协作”互动模式,运用语义分析技术生成课堂对话质量报告,通过“弹幕讨论-小组共创-成果展示”等形式增强参与深度。同时,构建“教师发展档案袋+学生学习轨迹图谱”双向反馈系统,实现教学相长。

(三)整合教学资源,构建优质数字生态

高校思政课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需构建“活水长流”的数字生态。其一,建立统一的思政课数字资源库,实现资源的集中管理与高效利用。通过自建、引进、共享三种方式改造物理空间、共建资源空间、打造社交空间,对思政课线上线下教学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实现虚拟与实体、隐性与显性、理论与实践等各类资源全覆盖^[1]。整合优质慕课视频、国内外实时新闻、典型案例、互动学习平台等资源,构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教学资源体系。其二,推动资源的系统化与开放化建设。通过制定统一的元数据标准与资源分类体系,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快速检索。打破封闭存储的壁垒,鼓

励、推动各平台之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促进资源的广泛应用。要依托智能技术打破线上线下教学场域壁垒,形成教学要素全周期流动、育人功能全方位渗透的教育生态。其三,建立资源的动态更新机制。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教学对象开展学情画像。通过实时抓取社会热点、舆情动态等信息源,及时更新教学资源库中的相关内容,确保课程的时效性与前沿性。通过精准分析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学科知识结构及个性化学习需求,建立“需求侧”与“供给侧”智能匹配机制。这种“靶向供给”模式,既能实现思政教育的精准滴灌,又可促进线上线下教学要素的深度耦合,最终形成分层分类、因材施教的智慧化育人格局。

三、结语

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浪潮中,高校思政课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将逐渐从理念探索转向实践深耕阶段,其本质是对数字时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实践解答。在此进程中,既要以“识变”的敏锐、“应变”的智慧、“求变”的勇气拥抱技术创新,亦需清醒认识到:数据隐私泄露、算法偏见等伦理风险可能成为技术赋能教育的“暗礁”——前者可能侵害学生人格尊严、威胁意识形态安全,后者可能消解思政课的思想性与价值导向。当数字文明与价值传承深度融合,思政课必将在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中彰显关键课程的关键作用,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基础。随着融合式教学模式的持续演进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未来的探索中,必将产生更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创新成果。

(下转第 64 页)

“‘城’与‘人’的双向奔赴”等五则

“城”与“人”的双向奔赴

如果对每一座城市进行画像，你会给合肥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 级力学系博士生杨远帆眼里，合肥不仅有“科气”还十足“客气”。

“现在我身边选择留在合肥发展的人越来越多了。”在合肥生活多年的杨远帆，对这座城市的“成长性”和归属感感触最深：合肥不仅给了像他这样的初创者更多成长机会，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落地生根”。

2024 年 10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滨湖科学城考察时指出，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

多年来，合肥始终把人才作为支撑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推出了一系列暖心政策。“近者悦、远者来”，实现了“城”与“人”的“双向奔赴”。

暖心纳才 成就城才“合璧”

“合肥很适合我。”这是一句在采访中不断被杨远帆挂在嘴边的话。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 级力学系博士生，2022 年他入驻“科大硅谷”蜀山园科创驿站科大站开始创业。

想起初来乍到时的情景，杨远帆仍然感慨万千：“当时，只是听说这里的科技创新氛围浓厚，就决定来试试。没想到，这一试，就让我爱上了这里。”

虽然还是学生，但杨远帆在两年多的创业时间里，和团队 10 多名年轻人一起，致力于将实验室内外的前沿科学成果以及国家大科学装置的科学原理用视频、AR、VR 等视觉技术呈现出来，把晦涩难懂的科学原理通过浅显易懂又极具美感的方式呈现。

杨远帆的公司位于蜀山园科创驿站科大站，与中科大仅一路之隔，大厦里除了入驻科大站的创新团队外，还有中科大牵头组建的安徽应用数学中心等多家企业。“蜀山区用购、租等市场化的方式，将辖区内的优质空间进行改造，腾给有潜力的科创企业。”蜀山科创集团负责人表示，“我们不仅重视高新技术企业，更重视未来科技之星的孵化。”

“驿站与学校之间的距离很近，对于在校生而言很方便，入驻之后，驿站还减免了一年租金，科大硅谷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创业支持。”杨远帆说，“在我们经营管理方面遇到难题的时候，驿站总是会想方设法帮助解决。”

这样的暖心之举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目前我们 70% 的客户来自中科大的各学院部门机构。今年我们将拓展科技型企业市场，用科学可视化技术助力企业科技研发成果多维度展示。”杨远帆说。

引才、用才，更要留才。学校给了这个年轻的创业团队很好的平台，而合肥的创业环境、创业政策更让这群年轻人在创新之路没有后顾之忧，助力他们取得一个又一个的科技成果。

杨远帆表示，合肥市政府从立项支持、资金补贴、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了创业者很大的支持。同时，这里还汇聚了众多风险投资机构，为创业者提供资金保障。“目前，我们的项目也已经进入了‘天使轮’，我相信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好的。”

在杨远帆的团队里，有和他并肩作战的校友吴毅龙，有曾在马来西亚留学的王达开，还有在新加坡、英国留学 7 年的范珂溶、来自马达加斯加的中国科大硕士留学生王双卿，这群 20 多岁的年轻人因为共同的梦想而聚集在合肥。

“作为青年科技人才，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在合肥考察时对科技人员的谆谆教诲：‘人生能有几回

搏’,勇于探索、发掘,用自己力量去真正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杨远帆的语气充满自信和坚定。

人才流向预见城市未来,城市未来吸引人才汇聚。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合肥累计吸纳高校毕业生超过110万人。《2024年中国人才友好型城市研究报告》中,合肥成功入选“人才友好型城市”“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最佳人才发展生态城市”榜单。

如今,“科里科气”的合肥正逐渐成为国内外众多科技人才心中的创业乐园。

城园相融 串出“幸福圈”

合肥人对于骆岗机场有着特殊的感情。从1977年到2013年,这座曾经安徽省唯一的国际机场见证了合肥发展的沧桑巨变。2013年5月,骆岗机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站在了转型和升级的十字路口,它的下步规划也牵动着合肥市民的心。

家住合肥市包河区骆岗街道滨水湾小区的82岁老人李开炳,是当年骆岗机场的建设者。“当年没有大型机械,完全靠人力,用小推车推,真是一步一个脚印建设起来的。”

“机场刚停运那会,我总担心会把灯塔、候机大厅这样的老建筑拆了。那样,大家的回忆也就没了。”李开炳告诉记者,由于住的近,他几乎每天都要去骆岗机场里转一圈,就像去看望一位老友。

直到有一天,机场周边建起了围挡。施工人员告诉他,骆岗机场改造开始了。“听说这里要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建公园。”李开炳说,这样消息让他期待了很久。

2023年,骆岗机场完成了华丽转身,成为了合肥城市中心的现代化生态公园。

开园第一天,李开炳特意约着几位当年参与机场建设的老同事一起来逛。“看到这些老建筑都在,而且还成了公园的标志,让我感受到了亲切和温暖。”李开炳颇有感触。

作为当下合肥最火爆的网红打卡地,骆岗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公园,占地12.7平方公里的绿地,有1700多个足球场大小。在这里,老机场那些昔日“时光印记”依然在“发光发热”——航站楼“变身”城市建设馆、信标台成了美轮美奂的“小蘑菇”、大机库改造成了颇有风格的艺术厅……老机场的回忆,在新的公园里无处不在。

“现在,骆岗公园不仅在设备上给市民和游客提供便利,而且在活动设置上力争做到‘周周有活动,场场有亮点’。”合肥市园林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开园至今,骆岗公园已举办科创类、会展类、体育赛事类、休闲娱乐类等各类活动800余场,接待超1600万人次游客。

在合肥街头巷里,“见缝插绿”让社区的“小绿地”释放着“大功能”。

秋夜,树影婆娑,凉风习习,家住合肥市同安街道王大郢社区的王德海像往常一样在小区边的公园遛弯。

“这里可是以前‘三不管’地方,各类垃圾乱倒乱放,居民来往都要捂着鼻子走。”面对这样的环境,王德海那时心里很着急。

“能不能把‘垃圾场’变成一个小公园?”这样的呼声在群众中越来越强烈。2023年3月,社区通过实地勘察、民意调查等,编制了口袋公园设计方案。半年时间,一个占地约9500平方米的“口袋公园”投入了使用。

“现在我们在自家楼下就可以休闲健身、欣赏美景,心里美滋滋的。”王德海脸上洋溢着满足。

方寸之间,幸福满满。如今,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口袋公园,像珍珠般散落在合肥的街头巷尾,成为了有温度的城市地标。“我们要充分利用城市边角地、闲置地等进一步来拓展绿色公共空间,推进城市绿地共享,将更多的绿地建在百姓身边。”合肥市园林和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从世界最大的城市公园到星罗棋布的口袋公园,合肥,让老百姓们的“诗和远方”触手可及。

“以心换心” 基层治理更贴心

“贾巷导员,一大早又开始忙碌了?”早上7时刚过,不少刚开门的商户就看到了他们熟悉的“身影”。

今年50多岁的贾永美是合肥市庐阳区逍遥津街道的一名“巷导”志愿者。“我年轻的时候在这一片当过辅警,对这的情况,我‘门儿清’。”说起自己负责区域的情况,贾永美如数家珍。

逍遥津街道位于合肥老城区核心区域,26条街巷交错,是典型的商住一体区域。商户与居民户数大体相当,加之商圈道路、管网不断升级改造,矛盾纠纷和信访投诉一度频发。

用百姓的方法,解决百姓的事情。2021年起,合肥市庐阳区逍遥津街道开始实施“巷导计划”,从群众中选取53名党员、志愿者、商户成为“巷导”,为辖区居民、商家提供多元化精准服务,多层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巷导’都是从老百姓中来,人熟、地熟、情况熟是‘巷导’们最大的优势,让‘熟人’来做群众工作,更让大家容易接受。”逍遥津街道九狮桥社区党委书记韩正琴解释说。

据统计,“巷导计划”实施以来,成功化解商圈矛盾纠纷210多起,物业领域投诉信访从每月40余件下降到个位数。

“我们平时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联系他。”王旭是勤劳巷巷口一家美食店的负责人,聊到“贾导”,他满口赞誉。“比如,我们店铺前两天因为路口噪音影响顾客就餐体验感,我第一时间找到老贾,不到10分钟就帮我们把问题解决了。”

民生无小事,解决好群众关心的“小事”,便是基层工作的“大事”。

“这里这里……”每天下午3时45分,合肥市蜀山区蜀麓苑社区的陈娜都会穿上“共享妈妈”志愿服务队的马甲出现在校门口。除了接上自己的孩子外,她还是其他5名孩子们的“共享妈妈”。

“年轻人在这里奋斗,接孩子放学是大难题。”陈娜说,社区如今有10多位具有育儿知识技能的母亲成为了“共享妈妈”。“我们不仅帮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还会带他们做手工、阅读、绘画、书法等。”

近年来,合肥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拓宽渠道、创新形式,充分激发群众参与小区治理的热情,在全市小区成立1957支志愿服务队、1488支党员先锋队,常态化为小区居民提供幼儿看护、上门送餐、便民理发、家电维修等志愿服务,真正做到让群众所盼“有始有终”,让群众意见“落地有声”。

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城市人民建。合肥,这座快速崛起的城市,正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在这里,人才不再是空洞的数字,而是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生态绿地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市民触手可及的美好;基层综合治理不再是冰冷的政策,而是温暖人心的服务。

合肥,正以它独有的方式,回应每个到这里来

的人的期待与梦想。

(作者:鲍玉蝉;来源:央广网,2024年12月)

合肥高新区加快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创”出新动能“闯”出新天地

安徽合肥高新区,有一条远近闻名的“量子大道”,几百米的街道,聚集了20余家量子企业。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我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均诞生于此。

拐过几个路口,便是科大讯飞、中科类脑等人工智能企业集聚的“中国声谷”。从提供知识问答、整理会议纪要的认知大模型,到面向基层医生提供辅助诊断服务的智医助理,再到通过声纹判断设备运行状态的智能产品,千亿级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在这里拔节生长。

10年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合肥高新区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仅为三成左右,如今,这一比例上升至超七成。作为新兴产业集聚地,合肥高新区“创”出新动能、“闯”出新天地的背后,有哪些精彩故事?记者进行了采访。

集聚创新要素,为企业孵化“搭台筑巢”

演讲稿在半空清晰成像,演讲更加轻松自如……今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典礼上使用的“空中成像提词器”,让现场师生啧啧称奇。

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韩东成介绍,通过自主研发的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能够让提词画面浮在空中,只有正面使用者能看到,配合自动翻页系统,让演讲体验更舒适。

走进东超科技的展厅,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应用引人入胜:在医院,医生可以进行非接触式查看档案、操控设备,减少交叉感染;在小区,点击空中按钮,便可自动开启垃圾分类站的投递门……科幻电影中的“隔空触屏”成为现实,东超科技年产值超亿元。

回首来路,东超科技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17年下半年,刚生产出国内第一块负折射平板透镜,韩东成就耗尽了启动资金。

困境中,合肥高新区组织的“合创汇”路演比赛带来机会。经过评估,东超科技获得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800万元投资。“有了这笔资金,我们

得以继续优化空中成像技术,持续推进产业化落地。”韩东成说。2020年初,东超科技研发出第一个成熟产品——非接触式电梯交互终端,只需点击空中按钮即可操控电梯。

作为初创型企业,想要顺利进入市场并非易事。在成果转化的关键节点,合肥高新区又将东超科技的产品列入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产品名单中,投入医院等应用场景。“这给我们提供了‘出圈’机会,发展壮大的信心更足了。”韩东成说。

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也要完善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让各类先进优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合肥高新区围绕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发展两条创新主线,聚焦源头技术挖掘、优化科创服务,加快项目孵化培育。“今年我们正式启动‘新质企业高成长培育工程’,将提供‘源头创新—成果转化—科技孵化—产业加速’的全链条服务,力争到2026年,新质企业群体数量实现倍增,突破3000家。”合肥高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说。

推动供需匹配,促进上下游融通创新

量子智能印章什么样?

走进位于中科大先研院未来中心的安徽云玺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童迎伟介绍:量子智能印章能够自动识别用印人、时间、地点等信息,用印数据实现量子安全加密传输存储,帮助解决政企印章移动监管难等问题。

“最开始我们主要研发物联网智能印章。后来,有客户提出更高等级的加密需求,这要用到量子加密技术和操作系统,但企业研发能力有限,挺犯难。”童迎伟说。

得知这一情况,中科大先研院很快为云玺量子牵线搭桥:需要量子信息技术,帮助对接科大国盾和国科量子,满足客户高端加密需求;需要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帮助介绍龙芯中科,使产品从原有的印签管理发展成自主可控的量子安全云办公系统;需要产品安全认证,就协调联系科大网络安全测评中心,提供全方位安全评测。

今年,云玺量子预计销售约2万套智能印章,营业收入比去年增长两倍。眼下,他们正加强与中科大合作,提升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实现视觉分析防遮挡、转移、抽换等功能,满足客户升级需求。

科技创新需要大量创新资源,而创新资源相对稀缺,这就需要加强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增强创新协同性和效能。

在合肥高新区,中科大先研院、中国科学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等重大协同创新平台积极布局,增强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能力,类脑智能国家工程实验室、合肥先进计算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相继落户运营。

目前,合肥高新区拥有省级以上研发平台、新型研发机构超400家。他们成立了“科大硅谷”工作专班,支持一批前沿性、颠覆性科技项目在合肥高新区转化、孵化。同时,定期举办“链通高新”活动,强化需求摸排与场景谋划,建立产品服务需求库,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深化机制改革,让更多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合肥高新区推动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让更多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在合肥中科采象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了“海洋石油720”深水物探船模型,其后拖着12条长长的海洋拖缆。2023年,这艘深水物探船完成了我国自主装备首次超深水海域地震勘探作业,其中,中科采象为中国海油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通过物探船搭载的成套拖缆装备‘犁’过海面,以地震波信号实现对海底地层的‘CT’扫描,便能看清海底的油气储层。”中科采象总经理张可立介绍。

公司起源于中科大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早在20年前,核心团队就投身高精尖海洋物探装备的关键技术研发,形成了一批专利,甚至做出了装备样机,但这些成果却始终未能走出实验室。

究其原因,过去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归属单位,按无形国有资产管理,难以赋权给技术发明人,转化审核流程非常繁琐。

畅机制,疏堵点。几年前,合肥高新区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展“赋权+转让+约定收益”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

“如今,将科技成果所有权通过先赋权再转让的方式,让渡给科研团队,允许自主成立公司,再通过约定收益的方式,实现了高校、科研人员、转化企业三方共赢。”张可立说,新模式让大家敢闯

敢试,激发了创新创业的热情。

这些年,合肥高新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制约科研活动的种种障碍,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的内生动力,推动创新人才不断涌现、创新项目持续落地。截至今年7月,合肥高新区有效发明专利累计超2万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近300件,位居全国前列。

推动科技与产业“双向奔赴”,竞逐新质生产力,更多的创新“种子”在合肥高新区结出硕果。

(作者:丁怡婷、刘志强、韩俊杰、王云杉;来源:《人民日报》2024年12月)

探访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国轩高科——

“用中国人的智慧 服务全球能源经济转型”

10月31日至11月5日,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应邀访问中国。这是17年来斯洛伐克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寻求与中国进一步开展经济合作的机会。”在向斯洛伐克议会介绍此次访华行程时,菲佐总理说。

在这次被自己视为“2024年最重要的出访”行程中,菲佐总理去安徽省合肥市考察了一家生产新能源电池的中国企业。这家企业,名叫国轩高科。

考察一家中国新能源领域的民营企业,为何会成为斯洛伐克总理访华的行程之一?这家中国企业到底有何魅力,能让这位欧洲国家的总理关注和点赞?带着这些问题,近日,本报记者实地探访了国轩高科,挖掘斯洛伐克总理点赞背后的故事。

一次考察

“害怕的人就不要进森林”

11月4日,菲佐总理率领的考察团来到合肥,开始了对国轩高科的考察。

国轩高科创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合肥,是中国最早自主研发、生产新能源电池的企业之一,最早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电池企业之一。

“我们公司主营磷酸铁锂材料及电芯、三元材料及电芯、动力电池组、储能电池组及电池管理系

统等,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领域,并为储能客户提供绿色能源系统解决方案。”国轩高科董事长李缜告诉本报记者,“作为一家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拥有全产业链制造能力,目前已经构建了从电池原料的矿产开采、材料生产、电池制造、产品应用,再到电池回收利用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

在国轩高科包河总部展厅参观期间,菲佐总理详细询问了电池包成组方式、固态电池的技术优势等,了解到国轩的固态电池技术可以实现传统电池翻倍的续航里程。菲佐总理还在验证院听取了有关电池测试验证的相关介绍。

在总部西街车展现场,菲佐总理参观了搭载国轩电池的奇瑞、江淮、长安、吉利、零跑、长城、赛力斯等新能源车型。

考察过程中,一个“矮墩墩白胖胖”的身影引起了菲佐总理的注意。

“这个‘大白’是国轩高科自主研发的易佳电智能移动储能充电车。”李缜向菲佐总理介绍,“它是一款集储能和充电为一体,可自由行驶、灵活移动,能随时随地为新能源车提供快速充电服务的全新产品。通俗地说,可以让新能源汽车充电实现从‘车找电’到‘电找车’。”

看到菲佐总理对“大白”非常感兴趣,李缜现场向他赠送了标准电芯模型及6辆易佳电智能移动充电车。对此,菲佐总理非常惊喜。在知道这款智能移动充电车是欧标产品时,他笑着说:“这是一份中国企业送给斯洛伐克的特殊礼物!现在我们可以讨论开展一项新业务了!”

走进菲佐总理参观过的新站大众UC工厂动力电池生产车间,本报记者看到,在电池产线上,自动搬运车将刚刚检测好的重约1.5吨的4块电池模组转移到电池包组装工序,接着工人在流水线上做进一步的配件组装操作,整个过程流畅自然。

“这些电池包不仅给国内的新能源车制造商供货,还远销海外。”国轩高科战略运营平台副总裁王永海告诉记者,目前国轩高科在中国、欧洲、非洲、美洲等已初步形成全球布局,从研发、制造、销售再到电池回收,构建了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去年已逐步在德国、美国、印尼、泰国、印度实现本地化生产。其中最新一代产线自动化率已达到

95%。”国轩高科欧非业务总裁蔡毅说。

“在‘万马奔腾’新能源动力电池的赛道上,国轩高科为什么能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将产品卖到世界各地,并在海外多国建厂输出‘安徽制造’,原因无他,就是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李缙说。

以 LFP(磷酸铁锂)电池为例,LFP(磷酸铁锂)电池具有安全、循环寿命长、成本低等优点,但能量密度较低阻碍了其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广泛应用。“在 2015 年以前,电芯能量密度 140Wh/kg 被认为是行业的天花板,但我们依靠科技创新,不断打破这个天花板。”李缙说,通过自研电池材料,加大工程研发投入,国轩电池的能量密度到 2019 年提升到 190Wh/kg。之后,国轩高科在 LFP 基础上加入锰元素,投入近 10 年时间研发启晨 LMFP(磷酸锰铁锂)电芯,实现 240Wh/kg 的质量能量密度,轻松实现 18 分钟的快充,并且通过了所有的安全测试。

“坚持自主创新,研发生产品质一流的产品,是国轩新能源电池畅销世界的重要法宝。”李缙说,“这也获得了菲佐总理的认可和点赞。”

“他引用了一句斯洛伐克谚语来总结这次考察活动——‘害怕的人就不要进森林’。”李缙说,“这句话表达了斯洛伐克政府在新能源领域勇于开拓、深度布局的决心和加强与中国合作的期待。”

一项投资

“为促进创新与工业化带来新机会”

菲佐总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来国轩高科考察?

这与斯洛伐克汽车产业正在进行的新能源汽车转型密切相关。

斯洛伐克是全球主要的汽车制造和出口中心,汽车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左右,2022 年斯洛伐克汽车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42%以上。斯洛伐克生产的汽车主要销往欧洲市场,根据欧盟理事会此前批准的法规,从 2035 年起欧盟境内将禁止销售非零碳排放的新燃油车,这意味着全面转型电动车领域已是必然之势。

因此,斯洛伐克迫切希望引进先进技术生产电动汽车和新能源电池。

2023 年,国轩高科与斯洛伐克电池制造商 I-

noBat 公司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计划在斯洛伐克建设一个位于舒拉尼的电动汽车电池生产超级工厂,于 2026 年开始生产。项目总投资 12.33 亿欧元,将为当地增加 1300 个就业岗位。

斯洛伐克经济部表示,该电池工厂的建设有助于推动汽车行业的电动化转型,对斯洛伐克汽车行业的未来发展、国家经济增长都至关重要。

InoBat 公司首席执行官玛瑞安 (Marian Bockek)告诉本报记者,“InoBat 在电池开发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但我们缺乏与业内龙头企业建立联系所需的全球影响力和网络,国轩高科的出现,让我们有机会在斯洛伐克甚至是整个欧洲提高市场覆盖率、吸引新客户、迎来全新的商业可能,还将有机会利用中国和欧洲的制造能力。我们之间的合作是欧洲电池行业的新里程碑,可以为促进创新与工业化带来全新的机会。”

“我们双方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尽快在欧洲实现电池的批量生产。有 InoBat 的协同,我们办理斯洛伐克项目所需的环评、建筑许可、和政府相关的生产许可和资质更加顺利,此外帮助国轩高科的电池产品在欧盟法规下合规,InoBat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蔡毅对本报说。

对于国轩高科与 InoBat 的合作,斯洛伐克从政府到民间都非常重视。

从 2023 年至今,就斯洛伐克项目推进事宜,斯洛伐克政府、InoBat 与国轩高科沟通频繁。

2024 年 8 月,斯洛伐克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萨科娃到访国轩高科,参观了公司总部和大众标准电芯工厂。她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全力支持国轩高科超级电池工厂项目。

2024 年 10 月底,由斯洛伐克政府组织的近 100 人的当地民众与媒体代表团,到访国轩高科总部与工厂,以民间交流的形式对国轩高科这家即将落地斯洛伐克的中国企业做了进一步了解。

代表团当中许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在 3 天的深入了解后,不少居民改变了当初的反对态度,转而支持项目的尽快落地。斯洛伐克舒拉尼地区居民伊万·舍本说:“在现场的参观让我们大开眼界,中国新能源工厂既环保又先进!”代表团回国之后,转变态度,协助本地组织和民众开展大规模的支持活动。

一份雄心

“在全球,为全球”

“我稍后准备与中东相关企业签订一笔电池供应合同。”11月25日,在通过跨洋视频接受记者采访时,蔡毅正在海外的一家酒店内准备签约协议。

“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和非洲地区都很受欢迎,当地政府也邀请我们去投资建厂。”蔡毅说,近年来,国轩高科加速全球化布局,已在德国、美国、泰国、越南、印尼等地建立多个生产基地。2024年上半年,国轩高科海外地区营收55.27亿元,占总营收的比例达到32.91%。

从2016年国轩高科电池搭载于上汽EV80亮相英国伯明翰车展,到2020年引入大众集团战略投资,再到2023年位于德国哥廷根的首条电池产线投产……在走过了产品出海、技术出海和资本出海三个阶段之后,国轩高科的海外发展之路已经打开。

事实上,不只是国轩高科,如今,海外市场已经成为国内电池企业密集布局的新阵地。截至目前,宁德时代、远景动力、亿纬锂能、欣旺达等多家中国锂电产业链企业均已公布海外投资建厂计划。

专家认为,中国电池产业链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与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密切相关。与国外企业相比,中国锂电原材料产业链较为完备,成本控制能力更强。

在绿色低碳的大潮中,中国企业抓住了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历史机遇,率先改换新赛道,形成了国际竞争新优势。

今天,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优质产能,为世界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中国的绿色产能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也有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碳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中国企业也受到越来越多当地政府和企业的欢迎。

“舒拉尼电池工厂建设项目是InoBat坚持‘在斯洛伐克,为斯洛伐克’原则的生动写照。”玛瑞安说,“国轩高科与我们的合作会促进新技术引入、加强创新支持,这无疑会推动行业发展。我相信,建成后的合资工厂将助推斯洛伐克成为欧洲重要的电池制造中心。”

像InoBat一样,越来越多全球企业正在主动拥抱中国新能源产业,分享发展机遇。

事实证明,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国际市场取得的竞争优势,靠的是“真诚+实干”:真诚地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真诚地深化改革开放,真诚地促进合作共赢;实实在在地抓技术创新,实实在在地抓产品优化,实实在在地抓产业升级。

“‘用中国人的智慧服务全球能源经济转型’是我们全球化战略的初心和使命。”李缙说,“未来,国轩高科将在打造全球一体化管理体系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完整的海外本土供应链,落实市场全球化、制造全球化、研发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人才全球化、管理全球化、产业生态全球化,最终实现‘在全球,为全球’的发展目标。”

(作者:杨俊峰、徐靖;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年12月)

让“往前赶”成为安徽又一个

鲜明气质

“使劲往前赶”——近段时间在安徽一些地市和行业调研,时常能听到这几个字。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新任务。牢记嘱托,往前赶、走在前的努力,不仅体现在安徽对高质量发展的部署、对干部队伍精气神的要求上,而且正在落实于2024年的经济表现和2025年经济工作的谋划中。

2024年12月30日至31日召开的安徽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信息显示,2024年安徽经济逐季向好、逆势上扬。2025年欲以上进对冲下行,努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抢占先机。

往前赶,呈现于安徽全面深改的目标任务中。2024年9月召开的安徽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通过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相关意见,明确提出了实现“六个新提升”、做到“六个当先锋”的安徽改革目标。其中“当先锋”,包含要勇当“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生态文明建设、增进人民福祉、践行‘三严三实’”六大方面的“先锋”。

往前赶,落实在高质量发展战略中。在2024年11月召开的安徽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

过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 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的决定》，对持续发力打造“三地一区”进行部署，其中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要“走在前列”，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勇当先锋”。“三个往前赶”的内涵，正式写进了这次全会的《决定》。

往前赶，是奋进的姿态；走在前列，是标杆的拉高。新时代新征程上使劲往前赶，才有可能让安徽在一些领域领跑当先锋，在一些领域从并跑向领跑、从跟跑到并跑。

往前赶，要从一些领域一些地市的奋进，进一步成为安徽上下所有领域所有地市的作为，汇聚成整个省新征程上奋发有为的鲜明气质。

往前赶，要有这样的精气神和作风。时间回溯到2024年7月安徽省二季度工作会议。这是这个省自2022年一季度以来坚持三年的季度经济形势分析调度会。在这次会议上，安徽提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劲头抓好每一天、使劲往前赶，要求“争先进位”，“处于跟跑的要努力并跑，处于并跑的要努力领跑，处于领跑的要继续领跑”。

“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出自《礼记·中庸》，原文为“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其要义，似可为“搏”。

“人生能有几回搏。”

在2024年最后一次“季度赛马会”上，经济形势分析中在全国领跑并跑跟跑的情况是重要内容，比如“很多领域位次靠前、持续领跑”“部分领域迎头赶上、实现并跑”“有些领域增长偏慢、仍在跟跑”。而地市、行业经济数据对比的维度，也从过去的省内自己比，扩展到放在全国看。比如“合肥前三季度经济总量居全国各城市第17位、同比前移2位”“阜阳同比前移1位”“滁州同比后移1位”“安庆同比前移3位”。

“跳起来摘桃子”，是这次会议上对安徽全省做好年底收官和谋划明年开局的形象要求。“跳起来摘桃子”和“往前赶”，内涵都是创先争优。

身处安徽，越来越能感受到“使劲往前赶”的压力和动力、鼓点和脚步声，也更期待“使劲往前赶”最好的成绩单。

——接续安徽“往前赶”的历史成绩单。

1978年1月，《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报道《安徽大步赶上来了》。

新时代以来，安徽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引领下争先进位。2013年，安徽GDP总量首破2万亿元，在全国排第13位；2018年突破3万亿元，五年跨上一个万亿元台阶；2019年位次前移至第11位；2021年突破4万亿元，三年再跨上一个万亿元台阶；2022年首次进入全国前十、列第10位；2024年前三季度，全省GDP总量为37257亿元，同比增长5.4%。

合肥市“往前赶”的迅猛势头更是成为现象级研究样本。2014年，合肥GDP规模为0.53万亿元，在全国城市中列第29位；2020年，合肥经济总量跃上万亿元，全国排名攀升至20位。而安徽其他三个总量靠前的地市同样明显“往前赶”。2023年，滁州市GDP在全国城市中的排位从2014年的第162位提升至第90位，芜湖市提升了20位，阜阳市提升了74位。

不仅是地市，行业也亮出“往前赶”的成绩单。汽车产业，是安徽从“0”到跟跑进而实现领跑的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奇瑞从“小草房”开始创业，到汽车产业2023年被列为安徽“首位产业”，汽车产业已经成为安徽万亿元产值的产业。2014年，安徽汽车产量95.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1.8万辆。2024年前11个月，安徽汽车产量320.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148万辆，均居全国第二，汽车出口量居全国第一；同期，奇瑞汽车海外出口104.6万辆，同比增长22.4%，连续第22年位居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

——发挥安徽往前赶的优势。

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是安徽最突出的优势。安徽从长三角一体化的“插班生”，变成“正式生”，正在努力当“上进生”。从安徽来讲，加入长三角，就犹如种地，改良了土壤和墒情，加上优质的种子，庄稼就长旺盛了。2024年前11个月，沪苏浙在皖投资亿元以上项目近四千个。

强劲活跃的科创动能，是安徽最鲜明的优势。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撑滨湖科学城、未来大科学城的梦想；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使安徽在前沿领域原始创新能力走在前列。

高质量科技供给不断涌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快融合,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构建中。在安徽,以新能源汽车、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等先进制造业集群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在从树林向森林发展壮大。低空经济、智能算力规模居全国前列。2024年前11个月,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居全国第四。

——拓展安徽往前赶的空间。

未来已来,空间无限。2024年9月印发的《安徽省未来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明确了“7+N”未来产业培育工程,即量子科技、空天信息、通用智能等7个重点领域和N个兼顾发展领域,启动建设10个未来产业先导区。

发展“落差”也是往前赶的空间。国土面积占安徽的38%、承载全省48%常住人口的皖北,2023年人均GDP只相当于长三角2010年的水平,GDP总值只占全省的27.4%。“皖北振兴”行动(2024—2027年)正在路上。2024年前11个月,皖北地区制造业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增速高于全省。

短板即增长空间。从全国看安徽,15个行业投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行业比全国水平低。视野再向外,2024年上半年,长三角其他省市的外贸依存度超过51%,而安徽约只有其三分之一。但2024年前11个月,安徽进出口总额增速已经从低于全国转为高于全国。

安徽和全国各地一样,有往前赶的责任和信心,有往前赶的定力和耐心。坚持干字当头,增强信心、迎难而上、奋发有为。以“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壮志,“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劲头,使劲往前赶,走在前列,才能始终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公认的事实,创新是安徽最鲜明的气质,改革是安徽最具优势的基因。拭目以待,新时代安徽又一个鲜明气质——“往前赶”!

(作者:刘菁、马姝瑞;来源:新华网,2025年1月)

实现“从0到1再到N”的跨越

——合肥高新区深耕未来产业

近日,深空产业协同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第

一届深空产业论坛在安徽合肥高新区举办,标志着深空探测产业化进程迈出坚实一步。此次活动的举办,也是合肥高新区着力发展未来产业的生动注脚。

近年来,合肥高新区紧盯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新趋势,招引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和高能级创新平台,围绕量子科技、下一代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新兴赛道和未来产业,持续开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取得丰硕成果。

量子产业领先世界

2024年12月8日,合肥量子计算与数据医学研究院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本源量子计算科技(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揭牌成立。这是我国首个量子计算与数据医学研究院。

合肥高新区对量子产业的布局,可追溯到15年前。

2009年,在国家鼓励成果转化的背景下,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盾量子”)在合肥高新区应运而生。该公司的成立,拉开了合肥高新区乃至安徽省发展量子产业的大幕。

彼时,量子信息产业尚属“无人区”,大众对于量子技术还很陌生,合肥高新区在国内率先探索量子科技产业化,并前瞻布局这一未来产业赛道。以国盾量子为起点,数十家量子科技企业陆续在合肥高新区扬帆起航。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一大批前沿科技成果在合肥高新区诞生。

2023年,合肥高新区成功引进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信量子集团”),彰显合肥高新区深耕量子产业的决心。

中电信量子集团自成立以来,致力于推进量子通信产业化,先后推出20多项量子科技产品,应用范围涵盖政务、应急、工业、金融等多个领域,构建了“DICT+量子”全场景能力体系。“我们计划招募百余家生态合作伙伴,共同构建量子产业生态,加快量子科技与产业中心的建设。”中电信量子集团董事长吕品介绍。

15年来,合肥高新区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平台,联合产学研多方力量,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实现从“0到1再到N”的跨越式发展,呈现出与世界领先水平整体并跑、部分领跑的态势。

人工智能集群发展

为了抢占人工智能这一新兴赛道，合肥高新区将培育龙头企业作为首要任务。创建于1999年的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讯飞”），已从一个学生创业团队成长为摘得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全球冠军、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人工智能企业。

这背后，离不开合肥高新区的“管家式”服务，“扶早、扶小、扶硬科技”的科创环境，以及研发资金、人才政策等方面的配套加持。科大讯飞逐渐走出一条从智能语音到认知智能的自主研发道路，公司推出的讯飞星火大模型，对标国际一流，正在赋能千行百业。

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人工智能产业逐渐聚势成群。2013年，合肥高新区以科大讯飞为核心，成立国内首个专注于语音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级产业基地——中国声谷，带动一大批人工智能企业聚集发展。如今，中国声谷汇聚了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等100多家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平台，推动合肥高新区逐渐形成人工智能上下游产业链集群式发展格局。这里已成功研发出2000余款软硬件产品，上市了100多款首台套重大装备和首版次软件，智慧办公、智慧医疗等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70%，众多高端智能产品走向世界舞台。

为抢占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制高点，2023年10月，安徽省发布了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及相关政策。随后，合肥高新区也发布了推动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规划及政策，明确提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通用人工智能领先园区。

2024年12月28日，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先导区启动活动在合肥高新区举办，标志着安徽省内首个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创新生态空间启动。安徽省科技厅厅长赵明在启动仪式上说，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先导区从谋划到正式启动，带动众多优质的人工智能项目和服务资源加速聚集聚合，已接入算力数据、模型开发、场景创新等六大类25项关键服务能力。

如今，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等高能级研发创新平台、科大讯飞等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下，合肥高新区正在下一代人工智能赛道上阔步前行。

空天产业加速崛起

当前，以卫星通信、导航、遥感为代表的空天信息产业，已成为全球争相竞逐的万亿级“蓝海”。合肥高新区同样在加速布局这一赛道。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电科三十八所”）是位于合肥高新区的重要科研机构。2020年12月，由该所参与研制的国内首颗商业SAR卫星“海丝一号”发射升空，并在当月实现了我国首颗商业SAR卫星的高质量成像。

“海丝一号”并不孤单，在浩瀚太空中，与合肥高新区相关的卫星还有很多：“巢湖一号”作为“天仙星座”首发星，于2022年2月成功发射入轨；2023年9月，“合肥高新一号”成功发射；由深空探测实验室牵头研制的“天都一号”“天都二号”于2024年3月成功发射，为架设地月“鹊桥网络”提供先期技术验证……筑梦九天，合肥高新区从未停歇前进的脚步。

近年来，随着中科星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科星图气象生态全国民用总部、中科卫星空天信息产业基地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合肥高新区空天信息产业迅速发展。

尤其是深空探测实验室的成立，为合肥高新区空天信息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2022年2月，由国家航天局、安徽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三方共建的深空探测实验室在合肥高新区揭牌。深空探测实验室以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为牵引，梳理出十大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推动深空能源动力、深空智能控制、深空测控通信等前沿技术工程化、产业化进程。

刚刚成立的深空产业协同创新联盟将以深空探测实验室为引领，聚焦产业发展，通过融合思路促进科研成果就地转化，打造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示范田”和“主战场”，为深空探测事业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合肥高新区依托中国电科三十八所、深空探测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在空天信息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并逐步完善整个产业体系。一道道“星”光汇聚于合肥高新区这片热土，形成一个个未来产业新赛道，成为点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接下来，合肥高新区将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领域，加快科

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赛道上逐梦未来。”合肥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者:洪敬谱;来源:《科技日报》2025年1月)

本栏目供稿、责任编辑:黄宁平

启 事

本栏目属转载文章,因客观原因未及与作者提前沟通,请作者看到本启事后,与本刊编辑部联系(电话:0551-62206629),编辑部将按本刊相关制度向作者支付稿酬。

(上接第 53 页)

参考文献:

[1] 郑永和,刘士玉,王一岩.中国教育数字化的现实基础、实然困境与改革方向[J].中国远程教育,2024(6):3-12.

[2]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通知[EB/OL].(2018-04-25)[2024-12-19].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EB/OL].(2019-02-23)[2024-12-21].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201902/t20190223_370857.html.

[4]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2022-01-12)[2024-12-20].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12/content_5667817.htm.

[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6]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N].人民日报,2024-09-11.

[7]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N].人民日报,2025-01-20.

[8] 任艳妮.以“融合式教学”推进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意蕴和实践理路[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5(1):104-111.

[9] 卞靖懿.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高校思政课数字化教学平台构建研究[J].情报科学,2023(12):91-98.

[10] 吴满意,唐良虎.数字思政技术构件:内在意蕴、发展梗阻与纾解理路[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1-12.

[11] 熊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线上线下融合教学的实践探索[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2(6):101-105.

责任编辑:马俊

德者性之
端也



禮記樂記
中石書



强主明谐由等正治国业信善
富民文和自平公法爱敬诚友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 62206658 62206629
电子邮箱：XB1233@126.com

印 刷：合肥新南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自办发行
定 价：5.00元

